新史學二十三卷四期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經學、書院與家族——南宋末到明初江西吉水的學術發展

張藝曦*

本文討論元代江西吉水的經學發展，時代斷限自南宋始，歷元，而止於明初。主要從經學的交流與發展，書院的興建，以及地方家族的參與等視角切入，描繪當時吉水同水、文昌兩鄉及縣城的經學發展圖像。此圖像有兩條線索：一是觀察朱子學在地方上的發展，以及朱子學者與地方經師間的競合關係，包括楊萬里的《易》學，朱子學者劉清之的學術，王充耘所傳習的《尚書》學，以及縣城解氏家族等，顯示吉水士人受到朱子學者及科考取向的影響，使朱子學逐漸在地方上取得優勢地位，但其實際的學術流傳卻常中斷而不連續；一是注意地緣距離遠近所造成的影響，使各鄉學術有不同質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從鄉的層次進行研究有其必要。

關鍵詞：**吉水、朱子學、楊萬里、劉清之、王充耘、書集傳**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本文主要討論元代江西吉水的經學發展，時代斷限從南宋始，歷元，而止於明初。吉安位於江西中部吉泰盆地間，在宋代稱作吉州，入元後改稱吉安路，作為其屬縣之一的吉水反而改稱吉州。明初吉安路改為吉安府，吉州則回復原稱作吉水縣。(以下統一稱作吉安與吉水)吉安自宋以來就是江右的學術中心所在，元代吉水經學成就也頗為凸出，但由於資料有限，我們對其經學發展的詳情所知不多。因此本文擬以吉水為中心，從經學的交流與發展，書院的興建，以及地方家族的參與等視角切入，描繪當時吉水同水、文昌兩鄉及縣城的經學發展圖像。

此圖像有兩條線索：第一，朱子學經過宋末以來的發展，加上《四書集註》及朱注的經籍成為元代科舉考試的定本，而奠定其學術的優勢地位。過去我們較常看到大儒及其門人弟子間的交流互動，本文則希望觀察朱子學在地方上的發展，以及朱子學者與地方經師之間的競合關係。本文注意到楊萬里(1155-1234)與劉清之(1134-1190)這兩支的經學傳承、楊萬里與吳澄(1249-1333)在《易》學上的競爭，以及地方經師王充耘(1333 年進士)《尚書》學的流傳。楊萬里的《易》學跟朱子學並不同調，其學在經歷幾代以後，不僅在地方上的流行不如劉清之所代表的朱子學，同時也被吳澄的《易》學所取代。以縣城東門解氏為例，該族原本傳承楊萬里之子楊長孺(1157-1236)的《易》學，後來轉師吳澄，顯示吉水士人受到朱子學者及科考取向的影響，使朱子學逐漸在地方上取得優勢的地位。但我們若再細檢當地朱子學的流傳情況，卻可發現其學流傳頗為片斷破碎，以致劉清之之學須靠當地家族後人的追溯，才得以以一種類似虛構的形式受到繼承。

對比之下，王充耘的《尚書》學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個案。王充耘

的學術有兩面：一是教導士人如何在以蔡沈《書集傳》為定本的科舉考試中作答;一是發表個人意見，且不少意見與《書集傳》並不相合，但王充耘卻宣稱其學符合朱熹的不言之意。這個個案讓我們看到地方經學既往朱子學靠近，但又試圖修正朱子學的部分內容。

第二，地緣遠近有時更勝過既定的行政區劃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各鄉學術不必因在同縣而有同質的發展，而各鄉之間也未必有頻繁的學術交流，甚至可能各自獨立發展。這也提醒我們，在地方學術史的研究中，如何劃定其地域範圍是頗須斟酌的課題，當我們選擇一府、一州或一縣作為研究對象時，若是考慮到各鄉學術有不同質發展的可能性，則不僅從鄉的層次觀察時有必要，且不應以少數的幾個個案而籠統概括一府、一州或一縣的發展。[1]

二、江右經學

本文所謂儒學，包括經學與理學，兩者不盡相同又關係密切。一般認為，理學在入元後中衰，當時不常見到直接傳習理學的事例，而且人們還會因習理學而受人譏笑，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理學也許不是不受重視，而是傳習的方式改變，而其改變則與經學有關，當時許多經學研究都宣稱本於朱子學，以研習經學來證明理學的道理。因此，不直接傳習理學，也許正意味了將理學寓於經學中。如蕭啟慶

1 目前宋史學界對基層社會的研究，雖有一些研究者把鄉村、鄉里視為基-層社會，但宋代除了《海鹽澉水志》以外，幾無鄉鎮志一類的地方資料。是故，受資料所限，不易深入縣以下的層級進行討論。也因此，一般的宋史研究多聚焦於較府、州更小的行政單位「縣」，以縣為整合地方政治與社會結構的場域，討論包括縣學、縣衙、鄉賢祠、地方家族、鄉曲義莊，以及地方武力，以了解此基層社會。見黃寬重，〈宋代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運作——以縣為主的考察〉，頁 274-275。

先生指出，由於理學的內容開始進入科舉考試中，使理學與經學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亦可作為佐證。[2]

兩宋是經學發展史的高峰，二程與朱熹(1130-1200)都曾注釋五經中的幾部，如《周易本義》、《詩集傳》等。元代朝廷推尊朱子學，但科考並未盡廢漢、唐以來的古注疏，所以元代士人除了修習程、朱所注經，不少人仍兼習古注疏。[3]

元代的經學至少包括三類：一是科舉時文之學；這類科舉之學，除了經典的知識以外，還包括時文、詔誥，或策論的寫作；另外兩種，一是較狹義的，即專指以朱子學者對經典的注解為主的經學；一是在朱子學以外，兼採漢、唐以來古注疏及其他各類知識，有時甚至與術數之學有關。[4]本文所謂元代經學，主要指第一與第三類，這兩類又常常相互關涉。

學術傳習的場所多在書院或學校。南宋迄元曾有一波書院復興運動，以及書院官學化的趨勢；[5]因此元代講學活動雖然不盛，但仍有不少書院得到重修或興建。至於縣學作為一縣的統會之地，既是官方推行教化的場所，也是儒家士大夫實踐理想的重要園地，[6]而縣學教授或學正在官學經營中的角色也頗為吃重。[7]此外，地方上常有家塾或私塾，或以齋名，或名為書院但實為家塾或私塾。以吉水為例，縣城有東山書院，文昌鄉有文昌書院，而同水鄉則有南麓齋、

2 蕭啟慶，〈元代科舉特色新論〉，頁 1-36。

3 《四庫全書總目》，卷 21，頁 169。

4 如楊叔方的經學跟術數之學有關，而王充耘的《擬兩漢詔誥》則是專為科考編寫而成，後詳。

5 徐梓，《元代書院研究》，第 7 章；陳雯怡，《從官學到書院》，第 3 章。

6 方誠峰，〈統會之地——縣學與宋末元初嘉定地方社會的秩序〉，頁 1-22。

7 熊慧嵐，〈宋代蘇州州學的財務經營與權益維護——兼論州學功能與教授職責的擴增〉，頁 79-116。

三松書院，都是家塾或私塾性質的書院。當地著名的官方書院，則是位於廬陵縣城的白鷺洲書院，與吉水縣城及各鄉間都有一段距離。

書籍的流通也值得注意。相較於講學受到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經學書籍的刊刻與流傳較不受此限，所以較可能有跨地域流傳。在此試舉兩例說明：元代吉水劉岳申(1260-?)曾因劉辰翁(1232-1297)的推薦而知有《小學進業廣記》，得睹此書後，才知安福彭絲的經學造詣甚高。從劉岳申的反應看，在此之前他應未識彭絲其人。安福與吉水只在鄰縣而已，卻須藉由著作的流傳，才使彭絲的經學為劉岳申所知。另一位經學家王天與(1299 年詔授臨江路儒學教授)，吉安人，所屬縣分不詳，他在《尚書》學上的成就，使其名列江西五經學的代表人物之一，[8]但劉岳申也是讀其《尚書纂傳》後才知有此人。[9]

元代江西經學過去較不受人注目，這可能跟《四庫全書總目》編者側重浙江而相對輕忽江西經學有關。因此，明初楊士奇(1364-1444)的觀察便顯得很有意義，他說：

> 元之世，江右經師為四方所推服，五經皆有專門，精深明徹，講授外各有著書，以惠來學。當時齊魯秦蜀之士，道川陸奔走數千里以來受業者，前後相望。[10]

由此可知元代江西經學確有其成就。當時江西各地皆有以一經成名者，如《新建縣志》以熊凱、龔煥、王天與、朱公遷(1341 年通過鄉試)、黃澤(1260-1346)分別為五經學代表，五人各以某經顯名。[11]熊凱、龔煥、朱公遷都與雙峰學案的代表人物饒魯(1193- 1264)或饒應中有關，黃澤與吳澄則在師友之間，凸顯元代經學與理學間的密切關係。

8《(同治)新建縣志》，卷 47，〈儒林〉，頁 7。

9 兩例俱見劉岳申，《申齋集》，卷 2，〈禮記貫義序〉，頁 13-14。

10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 14，〈蘧闇集序〉，頁 5-6。

11《(同治)新建縣志》，卷 47，〈儒林〉，頁 7。

南宋理學諸家學說紛呈，不少人都上溯周敦頤(1017-1073)、二程作為其學術淵源，當時如朱熹、張栻(1133-1180)等人各成一家之言，江右雖有陸九淵卓然成家，但在陸氏歿後，江右一帶學術反而漸受朱子學所浸染。[12]因此《宋元學案》所列南宋末及元代的江右理學人物，多以朱子學者為主，且不少集中在江西北部，如柴中行(1190 年進士)、李燔(1190 年進士)、饒魯、湯漢(1244 年進士)、湯中(1226 年進士)兄弟等人。吉水位於江西中部，除了個別士人曾問學於饒魯以外，當地學術跟前述朱子學者淵源不深，而與出身當地的劉清之、歐陽守道(1209-?)等人關係較密。只有吳澄雖在江西北部，但與吉水士人來往頗為頻繁，似顯示了吳澄不同於其他江右理學家的地位與重要性。

翻檢光緒《吉水縣志‧藝文志》中所列的經學著作，會重複看到幾位作者的名字：解觀(1329 年通過鄉試)、解蒙(1329 年通過鄉試)、解開、王充耘、劉震(1321 進士)、周聞孫(1307-1360)。解觀、解蒙、解開三人出身縣城東門解氏家族，王充耘、劉震分屬文昌鄉帶源王氏與夏朗劉氏，周聞孫則是同水鄉的泥田周氏族人，顯示吉水經學發展主要以縣城與同水、文昌兩鄉為主。因此以下將以這三地為主進行討論。

在進入具體討論前，須先說明兩點：第一，由於本文重點放在討論學術交流的範圍，加上許多人的文集或著作今已不傳，所以本文對學術或思想內容的討論不多，但不表示那就不重要。第二，儘管元代的文學活動十分活絡，同時也不乏重要的文人，但此處所論將以理學或經學的活動為主，而未包括文學之士。如吉水劉詵(1268-1350)、劉岳申二人其名雖著，並被錄入《元史．儒學傳》中，但二人都以文學知名，[13]而列入〈儒學傳〉中，則是跟《元史》未區別儒林

12 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93，頁 3097。

13 四庫館臣對二人的成就便著眼在其文學寫作上，見《四庫全書總目》，卷 167，頁 1436；卷 166，頁 1425。

與文苑有關，[14]加上兩人的足跡所至，並未對各鄉經學發展有明顯影響，所以本文未將二人列入討論中。

三、南宋末同水、延福兩鄉的經學與家族

同水鄉原隸屬廬陵，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被劃歸入吉水，[15]但因同水鄉與同縣其他鄉之間有贛江相隔，加上地緣上跟延福鄉地相毗鄰，兩鄉之間的交流較密切，因此放在一起討論。

在同水鄉的相關資料中，南宋楊萬里常被人提及或引述。楊萬里是五十六都湴塘人，[16]以「誠齋體」著稱於世，並因其學行而被稱作一代儒宗，得列名於《宋史．儒林傳》。楊萬里少時習於安福王庭珪(1079-1171)門下，王庭珪有不少經學著作，尤其對《易》學造詣最深，[17]但因其所著《易解》不傳，我們無從判斷楊萬里《易》學在多大程度上受其影響。若據《宋元學案》所言，楊萬里之學來自廬陵胡銓(1102-1180)為多，[18]而胡銓之學承自胡安國(1074-1138)，胡安國則是私淑程頤(1033-1107)而有大成者，故楊萬里自許上承二程之學。[19]程頤曾

14 《元史》，卷 189，頁 4313。

15 《(光緒)吉水縣志》，卷 2，〈沿革〉，頁 5。

16 由於目前所見吉水縣地圖，以光緒年間修的《吉水縣志》所附的最清楚詳細，而地圖上的都里劃分主要確立於明代，所以本文沿用此劃分來定位人物所屬都里，以便讀者可以比對地圖，觀察人物所在的地理位置與距離遠近。蕭東海的《楊萬里年譜》以楊萬里生於吉水縣中鵠鄉新嘉里南溪湴塘村，恐誤。新嘉里確在中鵠鄉，但湴塘則屬於同水鄉五十六都。《(光緒)吉水縣志》，卷 4，〈里社〉，頁 53；卷 3，〈坊郭〉，頁 42。

17 周必大，〈行狀〉，收於王庭珪，《盧溪文集》，頁 5-6。

18 《宋元學案》，卷 44，頁 1427，王梓材案語。

19 參見曾華東，〈楊萬里治易考〉，頁 125-128；〈楊萬里性論的儒學構成〉，頁 29-32。

作《程氏易傳》，這是程頤的主要經學著作，且為理學家的經注作了示範；[20]胡銓著《易傳拾遺》十卷，此書師法《程氏易傳》而時出新意；[21]至楊萬里則另作《易傳》，除了引用《程氏易傳》，並參考史實以證其說，在宋代書肆間與程氏書合刊為《程楊易傳》。儘管元人陳櫟(1252-1334)對楊萬里《易傳》評價甚低，但如四庫館臣所言：「其書究不可磨滅，至今猶在人間也」，其易學成就仍有值得留意處。[22]

同水鄉當地士人自述其族的經學淵源時，常會追溯到楊萬里或其子楊長孺。以下便以同水鄉的花園王氏，以及泥田周氏與谷村李氏兩大族，加上延福鄉的秀川羅氏為主進行討論，幾族與楊萬里家族間或有姻親關係，或有學術傳承的淵源。

花園王端禮是元祐三年(1088)進士，嚮慕濂洛之學，築別墅於南山(位於其族所在的五十六都)下，以教四方學者。王端禮三子王鴻舉、王鵬舉、王鶚舉都曾登解試榜，王鴻舉的文行尤其得到楊萬里賞識。[23]曾孫王子俊因聞伊洛遺論而慨然有志於先代之禮，[24]曾問學於朱熹，並就近從學於楊萬里；朱、楊二人學術雖有異同，但都是在兩宋理學的脈絡下推尊北宋二程之學。此後王子俊闢三松書院於南山下，招徠族人與鄉里子弟前往學習，[25]楊萬里之子楊長孺亦在弟子列。[26]王

20 土田健次郎著，朱剛譯，《道學之形成》，頁 228-230。

21《宋元學案》，卷 44，《趙張諸儒學案》，頁 1426-1427；卷 34，頁 1170；以及同卷「忠簡胡澹庵先生銓」中王梓材的案語。

22 《四庫全書總目》，卷 3，頁 14。

23《(光緒)吉水縣志》，卷 37，〈文苑〉，頁 2。

24《(光緒)吉水縣志》，卷 8，頁 24，周必大為振古堂所作記。

25《(光緒)吉水縣志》，卷 36，〈儒林〉，頁 5；卷 5，〈山川〉，頁 7 記載王子俊講學於振古堂，振古堂是三松書院的中堂，堂中祀其先人。關於三松書院，見卷 22，〈書院〉，頁 20。「山松」應為三松之誤。

26《(萬曆)吉安府志》，卷 25，〈儒行〉，頁 5。

子俊受朱熹、楊萬里兩家學術的影響，但到楊長孺則一意宗主其父楊萬里，並以「不學誠齋者，非誠齋子孫」為家訓。[27]

居六十一都的谷平李氏可上溯到唐代西平忠武王李晟(727-793)，李晟之孫李游因封宜春郡侯而以宜春為家，五世後遷吉水谷村。[28]谷平李氏在宋代較著名者有李次魚(1140 年通過解試)及其子李概。李概以經學聞名，「吉一時人士皆宗之」，[29]族人李天麟、王子俊皆師從之，及其卒後，再轉入楊萬里門下。[30]李概除了與楊萬里家往來以外，也曾參與全國性的活動，結識朱熹、張栻等大儒。[31]

自宋以來已非寒族的泥田周氏也位於同水鄉六十一都，泥田周氏早期從廬陵遷居泥田，歷數百年後，族眾已逾千餘人，連周必大也曾與其通譜，自居為其族之一員。[32]其中周雲這一支與楊萬里或楊長孺的學術頗有淵源，周雲本人以詩文受知於周必大，與楊萬里、周必大二人相師友，而周雲諸子則受業於楊長孺門下，從周雲到其子周商英，周商英之子周堯章，周堯章之子周夢瀧、之孫周庭秀，都以

27《宋元學案補遺四》，卷 44，頁 117。至於《宋元學案》則直接把楊長孺歸入楊萬里之下，而沒有提及王子俊。

28 曾同亨，《泉湖山房稿》，卷 27，〈貴州按察司副使鹿南李公墓誌銘〉，頁 1。由於李中號谷平先生，所以也有將谷村改稱谷坪。

29《(嘉靖)江西通志》，卷 28，頁 41。

30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132，〈贛縣主簿李仲承墓誌銘〉，頁 5083-5086；《(光緒)吉水縣志》，卷 36，〈儒林〉，頁 4-5。但李天麟跟楊萬里之間卻似有齟齬，見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64，〈答李天麟秀才書〉、〈再答李天麟秀才〉，頁 2747-2752。

31 羅洪先，《念菴文集》，卷 13，〈明故通議大夫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谷平李先生行狀〉，頁 1；《(萬曆)吉安府志》，卷 25，〈儒行〉，頁 6。其他如李奧(1222 年進士)，與廬陵秀川羅大經(1226 年進士)、朱熹都有學術上交流或書信往來，見《(光緒)吉水縣志》，卷 36，〈儒林〉，頁 7。

32 王直，《抑菴文後集》，卷 8，〈吉水泥田周氏族譜序〉，頁 15-16；另參考梁潛，《泊菴集》，卷 5，〈泥田周氏族譜序〉，頁 25-26。

所習於楊長孺者相傳承。[33]

另一支從周子淵、周應龍到周京孫，父子孫三代都曾在朝任官，周京孫更因上書斥賈似道而去職。周應龍以經學聞名，弟子不少，包括廬陵秀川羅椅(1214-?)、羅履泰與郭正表都出自其門下。[34]目前所存周應龍的著作只有《文髓》一書，此書擇取唐宋八大家中的韓、柳、歐、蘇四家之文，予以批點，使讀者一覽而瞭然其文章法度，應是士人準備科考的參考用書。宣德年間周應龍的裔孫周歧鳳將此書付梓刊行，且有郭正表題字。[35]

延福鄉秀川羅氏的始祖羅崩在唐咸通年間(860-874)徙居廬陵化龍鄉(後改為化仁鄉)折桂里戡村，羅崩季子羅達遷秀川(後改稱煻下)橋廈，是為秀川羅氏基祖，其子羅紼(1118 年貢士)居印岡；[36]煻下位於化仁鄉六十都，[37]在印岡附近。[38]

秀川羅氏最初幾世主要以累積財富而崛起鄉里間，[39]到羅紼這一代由農轉儒；羅紼以詩經之學聞名鄉里，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舉吉

33《宋元學案補遺四》，卷 44，頁 119、125。

34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頁 59-62。《宋元學案補遺》以周應龍為「靜春私淑」，但所據資料則是解縉這篇文章，考其上下文，未見周應龍與劉清之有何關係，遂不取其說。周應龍字澤之，但王梓材等人則誤以澤之為名。《宋元學案補遺五》，卷 59，頁 20。

35 范邦甸，《天一閣書目》，集部卷 4 之 4，頁 513-514。

36 今名樓下，因「萬卷書樓」而得名。吉安縣人民政府地名辦公室編，《江西省吉安縣地名志》，頁 103。

37 化仁鄉入清後併入延福鄉，今為盤田鄉。位於廬陵縣北部，東界吉水縣。《(民國)廬陵縣志》，卷 3，〈坊都〉，頁 13。

38 關於煻下秀川羅氏的源流，參見《(民國)廬陵縣志》，卷 11 下，〈氏族表八〉，頁 7；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第 3 章。

39《平溪羅氏四修族譜》，卷 3，〈秀川列傳〉，無頁碼。

安上舍貢生，其子、孫、曾孫輩分別舉進士或得鄉貢，[40]不僅都以《詩經》登第，[41]且五代間食祿者達五十餘人之多。[42]時人贊歎道：

> 今江西通經之士固多，而詩學[按：詩經學]尤盛于廬陵，印山羅氏又其淵藪。三歲舉于鄉，殆無虛榜，六十年間，父子兄弟登科第者七人，如川之方增也。[43]

此外，羅紱的曾孫羅惟一則以《尚書》學聞名遐邇，所著《尚書集說》有楊萬里作序，讚賞此書既去取諸家之說，又有自出己意處：

> 《尚書集說》者，集諸家之說也。自孔氏[按：孔穎達]《疏義》而下，八九家與焉；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微；去其牴牾，而合其通達。至于文義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己見以補其缺，易其說以達其意。[44]

羅惟一與楊萬里的交情不淺，且與李概相識，故李概卒後，分別有楊、羅二人為作墓誌銘與行狀。[45]其他族人在羅惟一的帶領下與楊萬里往來，如羅如圭、羅子潛便在羅惟一的陪同下，登門敦請楊萬里為其族人羅如松作墓誌銘。[46]另一位族人羅俊師從楊氏父子，收藏與

40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126，〈羅元忠墓誌銘〉，頁 4911-4912。

41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81，〈羅氏一經堂集序〉，頁 3277-3278。

42 《(民國)廬陵縣志》，卷 11 下，〈氏族表八〉，頁 7；聶豹，《雙江聶先生文集》，卷 3，〈秀川羅氏族譜序〉，頁 33。《平溪羅氏四修族譜》，卷 3，〈秀川列傳〉，無頁碼。

43 周必大，《文忠集》，卷 19，〈題印山羅氏一經集後〉，頁 23。

44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82，〈羅允中尚書集說序〉，頁 3301-3302。此處標點似有誤，已改正。

45 墓誌銘事見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127，〈羅彥節墓誌銘〉，頁 4915-4916。據文中敘述可知羅如松與羅惟一同輩，而羅維藩(1130-1181)是其族叔父。

46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127，〈羅彥節墓誌銘〉，頁 4915-4916。

楊氏父子往來的信件書牘多達數箱，內容多是相互講貫規切之言。[47]

與羅俊同輩的羅椅是一位爭議性人物，羅椅早年拜泥田周應龍為師，且為其師在六十一都建磻溪書院，此後他遠遊江西北部，轉師從饒魯。[48]此事頗為周密所詆斥，指羅椅師饒魯係因見朱子學盛而攀附，待宋亡又棄若敝屣。[49]但《吉安府志》及羅洪先則強調他上書力詆賈似道之罪及助文天祥(1236-1283)事。羅椅在世時，其家號稱富有十萬金，有「羅半州」之稱，[50]當文天祥起兵勤王、需餉孔急之際，羅椅盡力資助之，[51]而此事遂成為秀川羅氏由盛轉衰的關鍵。晚明羅大紘(1586年進士)指出，羅氏家族「至宋豫章氏以理學顯，後遂無聞」，豫章氏即羅椅，而「後遂無聞」，則是指秀川羅氏本支後漸衰微，反而旁支在入明後更盛過本家。

四、元代同水、延福兩鄉的經學與家族

宋末元初的易代之亂，江南、江西一帶都受創不小，[52]此際同水鄉湴塘楊叔方、泥田周聞孫以經學擅名當代，而谷村李氏、花園王氏則未聞以經學見長者。楊叔方傳劉清之之學，周聞孫之學則可能淵源於其曾祖周應龍。以下分述之。

47 羅椅，《澗谷遺集》，卷 3，〈族兄浮雲評事壙誌〉，頁 11-12。

48 《(光緒)吉水縣志》，卷 22，〈書院〉，頁 20。周應龍，號磻溪，此處「蟠溪」應是「磻溪」之誤。

49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頁 1-3，「羅椅」條。

50 羅洪先，《念菴文集》，卷 21，〈展先澗谷府君墓〉，頁 17。

51 《平溪羅氏四修族譜》，卷 3，〈秀川列傳〉，無頁碼。

52 如李祁指出：「蓋自喪亂以來，江南數千里莽為丘墟，士大夫家求一經一史且不可得，況乎鄉里僻陋之民哉。」儘管未必真如其所形容的「士大夫家求一經一史且不可得」，但仍可想見受創之深。當時江西受創也同樣嚴重。李祁，《雲陽李先生文集》，卷 5，〈史畧故序〉，頁 8。

吉水楊氏家族分作湴塘與楊莊兩支，兩支所在地相鄰近，且人才輩出，如解縉(1369-1415)引楊萬里之序文說：

> 文節序稱：二族入國朝來，至於今，第進士者十有三人，楊莊居其九，曰丕，曰純師，曰安平，曰求，曰同，曰邦乂，曰邁，曰炎正，曰夢信；湴塘居其四，曰存，曰杞，曰輔世，曰萬里。楊氏自太尉以來，大抵以忠孝文學相承，而近世卓然冠吾族者，忠襄公也，公之死節有傳矣，而十三人之中，公父子及一孫，一家而四人焉。[53]

忠襄公即楊邦乂，湴塘楊氏以楊萬里之名最著，楊莊楊氏則以楊邦乂為首。湴塘楊氏在楊萬里、楊長孺父子之後未見經學方面的傑出人才，而楊莊楊氏則有楊邦乂的從孫楊叔方傳劉清之之學，據載：

> 學睡翁少傳靜春之學，通詩、書、易、春秋，下及天文、歷數，靡不研究精密。著《五經辨疑》、《歷法五行論》等書行世。在宋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之姦，已而歎曰：水火怒，文明將食，此天道人事將代易時也，盍歸乎哉！……始築室茲山之麓，而題其額曰南麓齋，四方學者爭造其門。[54]

學睡翁即楊叔方，可知他所習除了經學以外，還包括天文曆數等術數之學。當楊叔方在南麓齋講學，四方學者爭造其門，其經學主要傳范德機(1272-1330)，曆法傳習吉翁，天文數學傳鍾朗。[55]范德機是清江人，他往來南麓齋與印岡兩地，同時習於楊叔方、羅履泰、郭正表三人門下，但因他只有詩集傳世，所以不易知曉其求學的詳情，

53 解縉，〈泰和楊氏族譜序〉，收入《楊萬里集箋校》，附錄四，頁 5358-5359。另可參考羅洪先，〈廬陵楊氏重修大同譜序〉，收入《楊萬里集箋校》，附錄四，頁 5361-5363。

54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7，〈南麓齋記〉，頁 70。

55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 18，〈韓柳文〉，頁 11-12。

僅知其學得於楊叔方為多，是其經學傳人，同時也是羅、郭二人諸多弟子中的佼佼者。[56]楊叔方之子楊中習於范德機門下，有可能間接傳承了楊叔方的經學，接著楊中也在南麓齋講學，廬陵劉性、族人楊謙師從之。[57]楊敝(1415年進士)說：

> (學睡翁)築室所居鹿山之下，名曰南麓齋，日與四方學者切磋講論，而凡造公之門者，皆為時名人，由是南麓之學遂聞天下。至先大祖文川翁、從大父濟川，俱以清脩雅望知名當時，而所以講明夫南麓之學者，相繼不輟。[58]

文川、濟川即楊中與楊舟，二人因著《文川集》與《濟川集》而有此稱，可知楊中、楊舟曾先後主持南麓齋。楊舟長於詩經學，曾作《詩經發揮》，此學來自南城謝升孫，顯示楊叔方之學不僅間接傳至楊中，在楊舟這一代，傳承的主線還被謝升孫的《詩經》學所奪。[59]

但楊敝卻始終執定家族與南麓齋兩點談其學術傳承。承前引文，他繼續說：「近世家君復改築南麓為堂宇而增脩之，環以崇墉，列以佳樹，積書數千卷，昆季子弟絃誦其中，蓋將以少繼先志也。」[60]家君即楊瑒，字季琛，明初人。從楊中到楊舟，中間經歷元末亂事，

---

56 劉岳申，《申齋集》，卷4，〈與范德機書〉，頁11-13；《(民國)廬陵縣志》，卷19上，〈儒林〉，頁4-5。

57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7，〈南麓齋記〉，頁69-71。劉性，字粹中，廬陵人，曾應詔修宋遼金三史，未成而卒，《(萬曆)吉安府志》，卷18，頁 27。文中的楊搤謙，應即楊謙。楊謙傳記見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8，〈元龍興路儒學正楊公墓誌銘〉，頁261-262。

58 這段話是楊敝向金幼孜說的，見金幼孜，《金文靖集》，卷8，〈南麓齋記〉，頁19。楊中與楊敝的關係，參見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0，〈題楊文川詩後〉，頁137。

59 《(光緒)吉水縣志》，卷41，〈隱逸〉，頁4；《(同治)南城縣志》，卷8之1，〈文學〉，頁24。

60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8，〈南麓齋記〉，頁19。

南麓齋毀而復建，[61]而楊瑒則再改築增修。前引文末說「講明夫南麓之學者，相繼不輟」，在楊莊楊氏族人的認知裏，以南麓齋為中心，他們所承續的仍是楊叔方之學。

據前述可知，入元以後，以《易》學聞名的楊萬里，其學在同水鄉已未見明顯流傳；楊叔方所學源出廬陵劉清之，以南麓齋為中心傳承其學，從楊叔方、楊中、楊舟，到楊瑒與楊敳，前後學術上雖未必有所淵源，但都始終執定南麓齋不變，此正凸顯出家族的作用。

周聞孫以經學聞名於世，[62]其門下弟子之多，足與周應龍盛時相埒，[63]《吉水縣志・藝文志》上列有不少周聞孫的經學著作。周聞孫的學術淵源不詳，若考慮到泥田周氏的家族學術傳統，則周聞孫的學術承自其祖周應龍的可能性很高。晚明鄒元標在回顧元代經師時，分別提及周聞孫與王充耘(文昌鄉人，後詳)等人，[64]顯示二人聲名流傳至晚明而未被人所淡忘。

同一時期，廬陵延福鄉有秀川羅履泰、[65]郭正表二人為代表人物。[66]郭正表屬於廬陵城岡郭氏家族，族祖郭公度與楊萬里、楊長孺父子相友，曾與歐陽守道同主白鷺洲書院講席。[67]族人郭儀直師從劉

61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7，〈南麓齋記〉，頁 69-71。

62 周聞孫之父周厚，以隱德忠厚聞，曾手編《漢書會要》四十卷傳周聞孫。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周以立傳贊〉，頁 21-23。

63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頁 59-62。

64 鄒元標，《鄒子願學集》，卷 4，〈仁文會約序〉，頁 81。

65 據〈氏族表〉，羅履泰舉家遷至翠屏，但地圖上未見此地名，〈氏族表〉另處載其子羅文節居純化鄉八十都，是為古潭溪羅氏。《(民國)廬陵縣志》，卷 11 上，〈氏族表七〉，頁 13；卷 11 下，〈氏族表下〉，頁 7。

66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頁 59-62。

67 何中(1265-1332)，《知非堂稿》，卷 10，〈江村小隱記〉，頁 1。郭公度之父郭子晟是宋寧宗嘉定十六年癸未(1223)進士。

清之，連帶影響其他族人的學術走向，[68]如郭適(字圖南)亦傳劉清之之學。[69]也有記載說郭正表師從劉清之，[70]而其弟子周鼎(1245-1327)，延福鄉大庾村人，也被視為是劉清之的數傳弟子。[71]儘管事實未必如此，但仍凸顯郭氏族中有不少人傾向劉清之之學的立場。

羅履泰是秀川羅氏的一員，其學術淵源不詳，但頗為時人所推重，吳澄與郭正表二人年歲雖長於羅氏，也都願推先納交。據方志轉錄的秀川文獻所載，羅履泰所著經解包括《易經》、《周禮》、《禮記》與《春秋》，能發先儒所未發，吳澄讚許其「於經亦有見」；[72]他也曾考訂史籍，[73]但獨漏《詩經》與《尚書》，顯示其學與秀川羅氏的《詩經》學、羅惟一的《尚書》學的關係不深。族姪羅中德(字)傳承其學。[74]至於羅履泰之孫羅大已則承續秀川羅氏的《詩經》學傳統，[75]

68 何中，《知非堂稿》，卷 10，〈江村小隱記〉，頁 1。

69 劉岳申，《申齋集》，卷 10，〈處士郭圖南墓誌銘〉，頁 14-16。

70 宋濂，《宋學士文集》，卷 12，〈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頁 14。

71 另據宋濂所言，周鼎的五經之學來自郭正表。周鼎對六經皆有論著，但都未及完稿，而只完成《詩經辨正》一書。宋濂，《宋學士文集》，卷 12，〈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頁 14-17。其子周愷承其學，見《(民國)廬陵縣志》，卷 19 上，〈儒林〉，頁 5；卷 19 中，〈文苑〉，頁 14。

72 吳澄，《吳文正公集》，卷 28，〈題戰國策校本〉，頁 32。

73 劉岳申，《申齋集》，卷 2，〈羅中德詹集序〉，頁 12-13；卷 9，〈有元隱君子冷正叔桐鄉阡碣〉，頁 3-5；吳澄，《吳文正公集》，卷 28，〈題戰國策校本〉，頁 10-11；《(民國)廬陵縣志》，卷 19 上，〈儒林〉，頁 4-5。羅履泰因所編訂蔡沈《書集傳》不合體例，招致許謙的嚴厲批評，見許謙，《白雲集》，卷 3，〈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洨點書傳書〉，頁 27-28。

74 劉岳申，《申齋集》，卷 2，〈羅中德詹集序〉，頁 12-13。羅履泰之子羅文節則以宦業聞名，《(民國)廬陵縣志》，卷 17，〈宦業〉，頁 18-19。

75 《(民國)廬陵縣志》，卷 26，〈藝文〉，頁 9。羅啟南之子羅宜範，曾在羅大已門下習《詩經》；楊士奇，《東里續集》，卷 30，〈靖江府紀善羅君墓表〉，頁 22-23。

以博學聞名，著有《四書直解》，[76]及與王禮(1314-1389)合著之《史略考》。[77]在此我們又看到家族的作用：儘管幾代間未必有明顯的學術傳承，但在家族的記載中仍將幾人並列，強調彼此間的家族聯繫。

羅履泰與郭正表的著作不傳，二人雖曾師事周應龍，但因相關資料太過簡略，我們不易判斷學術淵源的深淺，但包括羅椅在內，有可能都只是跟隨周應龍學習科舉時文之學而已。此外，秀川文獻記載羅、郭二人的學術足以跟當時擁有全國性聲望的吳澄相提並論：「當元之興，學校之教未周，自履泰與吳(澄)、郭(正表)諸君倡明理學，以續有宋諸儒之傳，士人稍稍知正學。」[78]

這段資料不無誇大的可能，但仍凸顯出二人對廬陵當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從有記載說郭正表傳劉清之之學，加上楊叔方，正反映了當時劉清之之學在同水、延福兩鄉聲勢之盛。

五、朱子學者劉清之

劉清之的學術對廬陵的影響較大，且及於同水鄉；但因沒有文集留存下來，所以我們只能藉由一些相關資料進行討論。劉清之源出於史學大家劉敞(1019-1068)、劉攽(1023-1089)所屬的清江墨莊劉氏，[79]劉清之及其兄劉靖之(1128-1178)都是宋高宗紹興年間進士，劉靖之聲名較著，待劉靖之去世後，劉靖之的門人弟子漸轉投劉清之門下。[80]劉靖之生前常閉戶讀書，不甚與人交接，反觀劉清之則與當世的理學

76 《(民國)廬陵縣志》，卷 19 中，〈文苑〉，頁 14。
77 《(民國)廬陵縣志》，卷 26，〈藝文〉，頁 38。
78 《(民國)廬陵縣志》，卷 19 上，〈儒林〉，頁 5。
79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109，〈又與新吉守劉伯協〉，頁 4171-4172。關於此族的研究請見劉師舜，《墨莊劉氏之創始與繁衍》。
80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59，《清江學案》，頁 1940。

大儒頗有往來，他曾入朱熹門下，與張栻等人也有交集：

> 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81]

地方志記載劉清之自清江徙廬陵永福鄉二十五都第四塘，[82]但另據解縉所言，劉清之晚年遷居螺岡，位於廬陵縣城北十里處，此地南臨贛江，溯贛江而上很快便可抵達縣城與同水鄉；[83]交通上的便利，可以部分解釋其學為何傳入吉水縣城，並與同水鄉楊長孺之學在吉水縣城交集，成為縣城東門解氏家族的兩大學術源頭所在。(後詳)

劉清之之學在吉水另有發展，但在廬陵當地卻漸趨式微，王禮說：「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按：劉清之]得譽寡而蒙毀眾，道不得行於一州，而竟志以歿，是可不為深悲而痛恨也耶！」為劉清之之學不能大行於世而悲傷。王禮是元末人，距劉清之去世約僅百餘年的時間，他感歎說：

> 當伊洛之學盛行，先生身體力行，以與朱、呂數君子上下論議，故廬陵道學得齒諸任，自劉氏始。而近時邑人士子鮮有知者，豈先生爵位不大顯於世，故尊而信之者有不若慕忠節文章者之眾歟？抑至道難聞，師從者少，故其傳有幸不幸歟？……若道學之正，如日麗天，無異尚者，世之相去又若

81 《宋史》，卷 473，〈儒林〉，頁 12956。

82 《(民國)廬陵縣志》，卷 19 上，〈儒林〉，頁 2。若據〈氏族表〉所載，劉清之屬於廬陵永福鄉二十五都第四塘的劉氏家族，宋代從安福蜜湖遷居此地，但表上所列的家族成員，宋代只有劉靖之、劉清之二人，然後就跳到明弘治年間進士劉澤，更以下則是康熙年間人，故其記載未必可信。《(民國)廬陵縣志》，卷 10 上，〈氏族表五〉，頁 27。

83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溪澗周先生〉，頁 67-68。螺岡的位置見《(萬曆)吉安府志》，卷 12，〈山川〉，頁 2。

> 此其近也，乃罕有知先生之名，識先生之學者，其亦可嘆也夫！其亦可感也夫！[84]

從「近時邑人士子鮮有知者」、「罕有知先生之名、識先生之學者」兩句來看，廬陵當地士人對劉清之其人其學已不甚知曉，更遑論熟悉。我們無法從王禮的這段話精確判斷當時的實況，是否因為當地士人習朱子學而不知上溯到劉清之，才使王禮有此感歎。

在此我們看到家族的角色。吉水楊叔方以南麓齋為中心傳劉清之之學，其學雖傳范德機，但楊中又習於范德機門下，[85]儘管並無著作可供檢證，使我們難以確知楊中所學的是從楊叔方為多，或從范德機為多，但此後楊氏子弟仍以南麓齋為中心講學，在其後人的追述中，他們認為己所傳習的正是楊叔方之學；[86]正如明初金幼孜所言：「講明夫南麓之學者相繼不輟」。[87]於是劉清之之學因家族而傳，而世代傳承的關鍵，同族聯繫的重要性更勝過了學術內容。

綜上所述，地方士人既可直接與具全國性聲望的理學學者如朱熹、張栻等人往來，知名儒者如楊萬里，地方經師如李概、周應龍等人與朱熹等大儒往來或受其影響，加上朱熹的門人弟子如劉清之的在地傳講，遂使朱子學傳入吉水。而從劉清之之學廣及於兩鄉，以及楊叔方在南麓齋吸引許多人前往求學等記載來看，顯示朱子學在傳入吉水後確實影響了不少士人。

我們在同水、延福兩鄉並未見到有規模的講學活動，在此背景

---

84 王禮，《麟原文集》，前集卷 9，〈靜春先生傳〉，頁 5。

85 楊中習於范德機門下，參見楊士奇，《東里文集》，卷 10，〈題楊文川詩〉，頁 137。但揭傒斯(1274-1344)則著眼詩學，說范德機「詩道之傳，廬陵楊中得其骨」，見揭傒斯，〈范先生詩序〉，收入《揭文安公全集》，文集卷 3，頁 8。

86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7，〈南麓齋記〉，頁 69-71。

87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 8，〈南麓齋記〉，頁 19。

下，同水、延福兩鄉展現出來的是多元的學術發展，在共同的理學脈絡下，推尊濂溪、二程，因此經師與經師間，以及知名儒者與朱子學者間的學術雖有異同，但並未造成彼此間明顯的隔閡。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家族的角色與作用得到凸顯；從楊叔方、楊中到楊舟，儘管學術傳承或有斷續，但因同族的緣故，使其後人仍信其所傳的是楊叔方之學。周應龍、周聞孫則因泥田周氏後續發展仍盛，使其聲名不至於湮沒無聞，儘管無從確知二人學術影響族人的程度，但其族人在回溯家族史時，都會以二人為家族的先賢典型。

六、吉水縣城經學與家族——從古城義塾到東門解氏

除了同水、延福兩鄉，作為全縣行政中心的縣城，則因歐陽守道在白鷺洲書院講學，及其弟子劉辰翁等人的經營，在宋末元初成為吉水的學術中心之一。

歐陽守道來自廬陵縣儒林鄉三都，自學成名而無明確的師承淵源，其學術推尊朱熹，故《宋元學案》將其列為朱子再傳。[88]歐陽守道三十歲前便以德行為鄉郡儒宗，南宋淳祐元年(1241)舉進士第；同年，吉安知軍江萬里在廬陵縣城旁創建白鷺洲書院，延請歐陽守道前來講學。[89]白鷺洲與鵝湖、白鹿洞並稱江西三大書院，吸引不少士人前往聽講，[90]如吉水劉南甫、胡銓的六世孫胡敬之都曾與會，[91]廬陵

88《宋元學案》，卷 88，頁 2944。

89 在歐陽守道後，如吉水許山立(號山梧)、臨江郭慶傳(字天隱)分別在至順、至正年間任白鷺洲書院山長，但都未能再造盛況。《(光緒)吉水縣志》，卷 37，〈文苑〉，頁 9-10。

90 著名者包括劉辰翁、聶淳、聶濟、鄧光薦、歐陽龍生、劉過、文天祥都出自其門下。《(民國)廬陵縣志》，卷 19 上，〈儒林〉，頁 2-3。

91《(光緒)吉水縣志》，卷 36，〈儒林〉，頁 7、又 7。

劉辰翁與吉水聶淳、聶濟兄弟則是歐陽守道的得意弟子。[92]

歐陽守道的白鷺洲講學促成吉水縣城古城義塾的興起，而從白鷺洲書院到古城義塾的講學，則可視為歐陽守道之學的進一步發展。古城巷位於吉水縣城東一里處，[93]宋末劉潛在此建古城義塾，聘廬陵劉辰翁為師以教四方學者，包括劉潛之子劉元亦以劉辰翁為師。此後劉元攝吉水縣令，常與當地學者往來，並在辭官後徙居古城長住：

> 元初時[按：劉元]未弱冠，按察使闢為掾，捧檄巡捕，永豐湖西民千餘家。遷章貢司，征調吉水攝縣令，而邑大治。日以其暇講學於衡齋周先生[按：周焱]、心遠聶先生[按：聶淳]、古澗曾先生[按：曾革]、介軒劉先生、靖軒夏先生、奎峰梁先生、高祖莊山解先生[按：解夢斗，1264 年通過解試]，故造詣高明，辭官卒業，因自金灘徙居于吉水古城之東，季大父伯中[按：解觀]其子壻也。父仕先學於于家，累世為同門相師友，聞之過庭之訓莫不推先生醇儒也。[94]

引文所提及的有不少是歐陽守道的弟子門人，如劉辰翁，屬於膾溪劉氏，位於廬陵安平鄉二十二都，[95]劉辰翁在南宋末曾及進士第，但因被賈似道所惡而遭置丙第，於是以親老為由請任濂溪書院山長，宋亡後逃於方外；[96]聶淳是吉水仁壽鄉六都大巷人，[97]其族少有名

92 解縉，《解文毅公集》，卷 16，〈跋文信國公手簡〉，頁 10。

93 《(光緒)吉水縣志》，卷 4，〈街巷〉，頁 55。

94 以上俱見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章江劉先生〉，頁 62-64。

95 《(民國)廬陵縣志》，卷 9 下，〈氏族表四〉，頁 20-21。

96 《宋元學案》，卷 88，頁 2963。

97 《(光緒)吉水縣志》，卷 34，〈宦業〉，頁 17，「聶以道」條記載為六都大巷人。而聶以道是聶淳之弟聶濟的第三子，先後在聶淳、劉岳申門下學習。劉岳申，《申齋集》，卷 8，〈元故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聶以道墓誌銘〉，頁 20-24。

人，直到聶淳及其弟聶濟始以文行聞名於世，聶濟之子聶以道則以宦業而為人所知；[98]解夢斗屬於縣城當地的東門解氏家族，他與聶家是世姻，並同師歐陽守道。周焱是寶祐年間進士，官南昌知縣，宋亡後不復仕，[99]周焱以真德秀(1178-1235)為師，精通理學、史學，所著《四書衍義》是承繼真德秀之學的結晶。[100]曾古澗即曾革，古城當地人。至於夏靖軒、梁奎峰，則未詳其人事蹟。

但過了一代以後，劉辰翁在吉水的學術勢力未見後續，聶氏一族亦未有以學術聞名者，於是，隨著古城義塾的中衰，解氏家族成為當地的學術中堅。解氏早在唐代便已遷居吉水，[101]先居同水鄉，後居縣城東門，[102]所以既跟同水鄉學術有所淵源，又因居此縣城輻輳之地而容易接觸他地學術。解氏家族的崛起可追溯到解谷(1183 年省試及第)，解谷及其弟解龍翔(1259 年進士)最初師楊長孺，[103]後轉入劉清之門下，解谷自號「生春」，意即「當不忘靜春之意」，[104]解谷的從兄解齊賢(字)亦習劉清之之學。[105]所以解縉敘述其家學淵源說：

> 縉之家學，傳於東山楊先生、靜春劉先生。[106]
>
> 語諸道德，輒舉所聞于大父竹梧翁，而泝其源于劉靜春、楊

98 聶以道雖以先人為榮，並拜解縉為師，但主要是因其仕宦成就而為人所知。劉岳申，《申齋集》，卷 8，〈元故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聶以道墓誌銘〉，頁 20-24。

99 《(光緒)吉水縣志》，卷 41，〈隱逸〉，頁 2。

100 王義山，《稼村類藁》，〈周衡齋四書衍義序〉，頁 3。

101 劉岳申，《申齋集》，卷 10，〈解上舍墓誌銘〉，頁 5-6；胡廣，《胡文穆公文集》，卷 13，〈解原昌墓誌銘〉，頁 18。

102 吳澄，《吳文正集》，卷 35，〈故宋太學進士解君墓表〉，頁 15。

103 《宋元學案補遺五》，卷 59，頁 19、20，王梓材的案語。

104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7，〈生春翰墨之際記〉，頁 52。

105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溪澗周先生〉，頁 67-68。

106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章江劉先生〉，頁 62。

伯子，以達于關閩濂洛，又未嘗為之億說也。[107]

劉靜春與楊伯子，即劉清之與楊長孺，在解氏族人的理解中，這兩支學術都可上溯到關閩濂洛之學，都是同一脈絡下的學術。

解谷藏書甚多，[108]築書屋與其弟解龍翔、其子解夢斗，及群從子弟共同講學為業。[109]解齊賢藏有不少劉清之手書的性命義理微言之書，待其卒後，這批書由解龍翔接收，解龍翔再傳予解夢斗。[110]解夢斗是使其族其學維持不墜的關鍵人物，他在南宋末年因在太學上書言事得罪賈似道而遭擯處於家，[111]居鄉時曾往白鷺洲書院問學於歐陽守道，其居鄉事跡可參考吳澄所作的墓表：

> 解君諱夢斗，字孔陽，一字星端，工舉子詩賦，宋景定甲子貢于鄉，咸淳戊辰(1268)入大學，越三年庚午(1270)又以大學薦名試禮部。曾祖叔達、祖寅，俱不仕，父谷，淳祐己酉、壬子(1249、1252)兩預江西轉運司貢。……大運將革，遂不復至大學，教授于家，父讓所受之世業與諸弟，父之弟翔龍沒於外，子幼，君為歸其喪，歲饑用己田易米賑施鄰里；母之黨貧，分食以食之；妻之父死，鬻產以窆之。科廢四十年，教子若孫勿棄舊學。[112]

107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6，〈送劉君孝章歸廬陵序〉，頁 17。

108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7，〈生春翰墨之隙記〉，頁 52；卷 8，〈伯中公傳〉，頁 5。但萬卷可能有誇稱之嫌。

109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7，〈生春翰墨之隙記〉，頁 52-54。

110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溪澗周先生〉，頁 67-68。

111 胡廣，《胡文穆公文集》，卷 13，〈解原昌墓誌銘〉，頁 18-19；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淵靜先生解季通〉，頁 32。二文中的「解昭子」即解夢斗，見《(光緒)吉水縣志》，卷 29，〈選舉志〉，頁 23；卷 30，〈選舉志〉，頁 34。

112 吳澄，《吳文正集》，卷 35，〈故宋太學進士解君墓表〉，頁 15。

由於元初曾廢科舉達四十年之久，士人失去出路，於是許多士人或縱情詩酒，或轉習他業，又或游走四方而為游士，當時能夠堅守儒學者並不多見。此際解夢斗一方面聯結家族，舉凡歸葬、賑濟皆一力承擔，一方面則勉勵子弟勿廢舊業。因此日後不僅解夢斗之子解應辰、解應申分別成為縣學學正，[113]解觀、解蒙、解泰、解子元(1345年進士)等人在學術或功名上也都有所表現。[114]

解氏家學本與楊長孺、劉清之有關，後轉受歐陽守道影響，到解觀這一代則又有變。[115]解觀年少時遍讀族中所藏萬卷書，並受業於解夢斗之弟主靜公(號)，天曆二年(1329)偕其弟解蒙應試不第，遂問學於吳澄門下，[116]此際恰逢吳澄先後完成《易纂言》與《易纂言外翼》二書，[117]這兩本書是吳澄《易》學的代表作，四庫館臣以「在元人說《易》諸家，固終為巨擘焉」的評價推崇其說，[118]加上解觀曾與吳澄

113 劉岳申，《申齋集》，卷 10，〈解上舍墓誌銘〉，頁 5-6。

114 解觀、解蒙多次進入解試名單，解子元則是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進士；解縉，《解文毅公集》，卷 13，〈時和曾先生墓誌銘〉，頁 19-21。解泰雖無功名，但也致力程朱理學；胡廣，《胡文穆公文集》，卷 10，〈淵靜先生畫像記〉，頁 42。

115 解縉以為解氏一族所傳承的楊長孺與劉清之之學，四傳到解觀、解蒙問學於吳澄以後有變。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章江劉先生〉，頁 62-64。

116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伯中公傳〉，頁 4-10。吳澄也提及天曆二年二人考取鄉試事。吳澄，《吳文正集》，卷 7，〈解觀伯中字說〉，頁 7。另據虞集所撰的吳澄行狀，那幾年正是吳澄居鄉撰作，吸引南北士人千百人前來問學的時期。虞集，《道園學古錄》，卷 44，〈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頁 2-14。

117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延祐三年條、至治二年條與天曆二年條。

118 《四庫全書總目》，卷 3，頁 22。《易纂言》在義理上本諸《程氏易傳》，並參以朱熹象占之說，有意恢復漢代的象數《易》，且「一決於象」，盡破先前傳註諸家離開經文發揮個人《易》義的穿鑿附會之論。相關研究見

論辨星曆，其見解頗得吳澄贊許，使吳澄願將所修《宋書》交付解觀，許其續成其業，據說後來朝廷所修《宋史》中有關天文星曆的見解有不少便是竊取自解觀之說；[119]因此解觀、解蒙二人的《易》學，應頗受吳澄的影響。近人研究指出，元代《易》學的兩大特色，一是闡釋朱熹《易》學，一是折衷程朱異同，[120]從楊萬里／楊長孺的《易》學到吳澄的《易》學，正好符合這個趨勢的發展。

楊士奇指出：「元盛時，吉水解氏治易有名江鄉間，而觀我、求我最著。」觀我、求我即指解觀、解蒙，[121]二人儼然成為縣城一帶的學術領袖，[122]尤以解觀的聲名最盛，鄉里間甚至流傳朱熹入夢中探問解觀其人的傳說。[123]解觀選擇在縣城旁建東山書院講學，[124]吸引不少人前往聽講，「弟子自遠至者甚眾」。[125]解觀重現了當年古城義塾的盛況，昔日主持古城義塾的劉元既是解觀的岳丈，劉元之孫劉珣亦受業於解觀門下，[126]而從「自遠至者甚眾」一句可推知前來聽講

詹海雲，〈吳澄的《易》學〉，頁 237-268。

119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伯中公傳〉，頁 4-10。

120 黃沛榮，〈元代《易》學平議〉，頁 159-194。

121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 17，〈解季通易義〉，頁 20-21。

122 解泰二子：解琛、解璋，解琛從解觀、解蒙學，治經不惑傳注訓詁，以踐履為先，解璋承襲家學，於易學有其造詣，得到解觀、解蒙的讚賞。《宋元學案補遺八》，卷 92，頁 105-106。

123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伯中公傳〉，頁 4-10。

124 仁壽鄉一都的金釵嶺有東山書院，即解觀所建。《(光緒)吉水縣志》，卷 22，〈書院〉，頁 14。

125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伯中公傳〉，頁 8。至於解泰晚年則回到同水鄉附近，授徒於同江之上，見楊士奇，《東里續集》，卷 17，〈解季通易義〉，頁 20-21。

126 王直，《抑菴文後集》，卷 31，〈劉君宗平墓誌銘〉，頁 30。劉珣之孫劉均則是受業夏朗劉子彰門下，劉子彰時任縣學訓導，見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9，〈故西山劉先生〉，頁 8-10。

者應不侷限於縣城當地士人而已。此後元末戰亂，解觀因不應陳友諒(1320-1363)之聘而死於亂事中，門人弟子隨之風流雲散。[127]

縣城學術從古城義塾始，後來歸於一族，這點跟同水鄉有相通之處。這既顯示家族的關係紐帶有利於學術的傳承，同時也讓我們注意到，無論是同水、延福兩鄉或縣城，所推尊的學術多半跟朱子學直接相關── 劉清之是朱熹門人，歐陽守道、饒魯是朱熹再傳，吳澄也未脫離朱子學的範疇。《宋元學案》說朱子學流行於江右一帶，此處正可作一印證。

通過對同水、延福兩鄉及縣城的討論，可以看到朱子學的流行，知名儒者楊萬里這一系學術的發展，以及地方經師的在地傳承。朱子學與楊萬里的學術影響範圍較廣，至少可以及於縣城，但學術傳承的中斷則是兩者共同面臨的危機。無論是劉清之、歐陽守道或楊萬里之學，都在一兩代後面臨學術能否延續的問題。儘管家族可以聯繫不同人物，但家族的聯繫並沒有形成實質意義上的家學或族學傳承。換言之，這兩個區域的學術發展與傳承所呈現的是一幅破碎的圖像，在這幅圖像中，沒有一門學術形成強固且連續不斷的傳承與勢力。

相對於此，地方經學在鄉里間的傳承，如前述周應龍所授多以科舉之學為主，看似影響範圍不大，傳承也常中斷，卻又未必可以一概而論。以下文昌鄉的劉實翁(1323 年通過鄉試)、王充耘的《尚書》學，則提供值得注意的例證。

七、文昌鄉的經學與家族

相較於同水鄉湴塘楊氏、泥田周氏，與縣城解氏獨盛的現象，文昌鄉則有夏朗劉氏、帶源王氏與虎溪蕭氏三族，在當地自有其學

127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章江劉先生〉，頁 62-64。

術傳承，而跟同水鄉士人在學術上較少聯繫。

夏朗劉氏的始祖可上溯到漢長沙定王發，其族人先後徙遷安福、泰和等地，宋初才由泰和株林徙吉水文昌鄉四十二都夏朗。夏朗劉氏世有科第，如劉天聲(1265 年進士)及其子劉益厚、其孫劉維德、曾孫劉永敬，世治《尚書》學，以文行、經學見稱鄉里。[128]劉實翁及其子劉震皆以《尚書》學為當地士人所宗主。[129]儘管不確定劉天聲與劉實翁兩支間的學術淵源深淺，但《尚書》學作為夏朗劉氏的家學應是很有可能的。此後元末亂事中劉震闔門戰死，其《尚書》學雖有王充耘繼承，但在夏朗劉氏間則中衰，直到明初劉震的從孫劉子彰被延為縣學訓導，始重光其族《尚書》學。[130]

有關文昌鄉四十六都帶源王氏的資料不多，僅知唐末自袁州白芒遷來，[131]落腳於廬陵甲村，此後分徙四方。[132]其族在元代有王相與王充耘二人頗著名。王相在地方經師朱啟夔門下習《春秋》學，以此經登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進士第。王相頗重視家族及地方事務，他在文昌鄉所建的文昌書院與孔廟成為帶源王氏族人及鄉里子弟的

128 柯暹，《東岡集》，卷 7，〈書菴劉先生墓誌銘〉，頁 1-4；吳寬，《家藏集》，卷 64，〈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墓誌銘〉，頁 22。吳寬文中的劉禮即劉永敬。

129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9，〈故西山劉先生〉，頁 8-10。至於《宋元學案》雖據解縉所作墓表而把劉實翁、劉震列為蔡沈(1167-1230)續傳(見《宋元學案》，卷 67，頁 2214)，但檢其墓表所述，未見二人與蔡沈有師承關係；劉實翁與劉震雖無著作傳世，但檢其弟子王充耘著作可知其《尚書》學跟蔡沈《書集傳》有關，因此《宋元學案》應是根據其學術內容，而非實際上的師承淵源而作此斷案。

130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9，〈故西山劉先生〉，頁 8-10。

131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翰林脩撰王君欽止先生〉，頁 46-48。

132 包括廬陵富田、六度，吉水帶原、固山，以及興國小春、泰和梅岡等地。梁潛，《泊菴集》，卷 7，〈梅岡王氏族譜序〉，頁 14-15。

讀書場所，[133]因此胡廣(1370-1418)把帶源王氏詩書風教之盛歸功於王相的興學，說：「其里舊建夫子廟，歲時朔望，長幼祭拜序登降揖遜之儀於其中，熙熙然鄒魯之鄉，視他為莫及，故其宗族之盛，人才之多，代有顯融，由其風俗之厚，詩書之教使然也。」[134]

王充耘是劉實翁的弟子，著有《書義主義》、《書義矜式》、《讀書管見》、《四書經疑貫通》、《擬兩漢詔誥》等書，《擬兩漢詔誥》今已不存，其他四本都跟《尚書》學有關。王充耘以《尚書》登第，所以他的《尚書》學廣為時人所重視。[135]這些著作多跟科考有關：《擬兩漢詔誥》供士人應付考試詔誥之用，《四書經疑貫通》用於回答經問，《書義矜式》講求如何撰寫經義格式，《書義主意》則是根據蔡沈《書集傳》加以發揮，有助於科舉的審題。[136]

至於《讀書管見》雖也是解釋經義之作，但因有不少內容駁斥蔡沈的《書集傳》，反倒跟科考的關係不深。蔡沈的《書集傳》是受朱熹之命所撰成，且經朱熹親自審訂過部分內容，所以自宋以來便有很大的影響力，至元代定蔡《傳》為科考專書後，一些不滿《書集傳》的著作更因乏人問津而先後失傳；[137]相對於此，《讀書管見》則與吳

133 劉三吾，《坦齋先生文集》，卷下，〈元翰林修撰兼國史編修國子博士王吾素先生墓表〉，頁 38-41。文中言所建社學有四齋二十二楹，另考方志所載，王相在帶源當地建文昌書院，則所謂社學應即文昌書院。

134 胡廣，《胡文穆公文集》，卷 12，〈帶源王氏族譜序〉，頁 10。如族人王濟即跟隨王相讀書，且列名儒林傳中。《(光緒)吉水縣志》，卷 36，〈儒林〉，頁又 7。

135 為王充耘書作序的人多提到他以《尚書》登第的事，如劉錦文〈書義主意序〉說他因王充耘登第而購其《書義主意》；張雲章在〈書義矜式序〉說：「充耘名進士，是編之出，操觚家詎不奉為鴻寶哉！」參見朱彝尊，《經義考》，卷 86，頁 472。

136 以上參見蔣秋華，〈王充耘的《尚書》學〉，頁 363-393。

137 蔣秋華，〈明人對蔡沈《書集傳》的批評初探〉，頁 269-294。

澄的《書纂言》[138]、金履祥(1232-1303)的《尚書表注》並列為元儒《書》解的代表作。[139]王充耘本人對此書也頗得意，不僅說「凡為吾徒者，須人錄一篇」，[140]且自許此書足以揭露朱熹不言之意，上會二帝三王經世傳道之心，他說：

> 而《書》者，暨(晦翁)垂沒且屬意蔡氏，今之坊刻，大抵皆蔡氏文也。充耘所論，詎云有異！然擇焉而約其所中，充耘自謂直可以揭晦翁不言之意，而上會二帝三王所以經世傳道之心。[141]

此言未與蔡《傳》明白立異，但自負已說可以切中朱熹的不言之意，顯示他仍希望與朱熹之學相合。就此看來，王充耘所代表的地方經學也受到了宋元以來朱子學的影響。

明初解縉準備省試時，解氏雖以《易》學見長，但當時主考官長於《書》學，遂改經以應試，並為此求助於帶源王氏，據載：

> 當時舉業甚少秘藏之者，帶源王氏得與耕[按：王充耘]之家傳，懇求不上三百篇，公[按：解縉]且讀且碎，兄綸止之，遂共讀竟日，盡書于冊以還。

最後結果是解縉兄弟分列第一、二名，帶源王無將亦名列榜上。[142]這則軼事既點出了在王充耘卒後，帶源王氏仍以《尚書》學作為家學傳承而聞名於時，且吸引了解氏兄弟的學習。

位於四十七都虎溪市的虎溪蕭氏家聲起於蕭來新(1262 年進士)，蕭

---

138 考定《尚書》之今、古文，自陳振孫《尚書說》始；分編今、古文，自趙孟頫《書今古文集注》始；至於專釋今文，則自吳澄此書始。見《四庫全書總目》，卷 12，頁 96。

139 《四庫全書總目》，卷 11，頁 96。另見李開先，〈四川按察司副使劉先生天民墓志銘〉，收入焦竑編，《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 98，頁 85-88。

140 朱彝尊，《經義考》，卷 86，頁 471。

141 王充耘，〈尚書論定序〉，收入《(光緒)吉水縣志》，卷 55，頁 6。

142 解縉，《解學士全集年譜》，卷首上，頁 15，「洪武二十年丁卯」條。

來新之姪蕭南翔(1267 年通過解試)、蕭南壽(1267 年通過解試)，人稱虎溪二蕭，幾人及其他蕭氏子弟在科舉上都有不凡的表現。[143]蕭符世(1268 年進士)以《詩經》學著稱且以此得第，並教導蕭氏子弟，《詩經》於是成為蕭氏家學，[144]劉岳申甚至說：「詩學最盛吉水，吉水推文昌蕭氏。」元初廢科舉時，則有賴蕭符世之子蕭如愚守《詩經》學不墜；待朝廷恢復科考，蕭如愚之子蕭立夫(1315 年進士)與其孫蕭霽(1329 年通過鄉試)陸續考取功名，[145]延續其族《詩經》學的傳統及功名成就不斷。除了《詩經》學的傳統以外，宋末劉辰翁避難虎溪蕭氏處時，不少蕭氏子弟從學門下，且與劉辰翁之子劉將孫(1257-?)共同讀書學習；[146]蕭甲叟頗受劉辰翁器重，當時遊劉辰翁之門者，皆出蕭甲叟下。[147]對此應可解讀為劉辰翁所師承的歐陽守道學術影響及於蕭氏族人。另一方面，元初篤守蕭氏家學傳統的蕭如愚則與夏朗劉實翁、劉震交情頗深，[148]且曾請吳澄為家人作墓誌銘。[149]

143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 28，〈登仕郎贛州路同知寧都州事蕭公行狀〉，頁 2。另一支是蕭濟美之父蕭德孫，蕭德孫藏書千卷，與同州胡銓、楊萬里等人都有書信往來，當元初廢科舉時，他率領族人不易所學，終於有蕭濟美得中鄉試。蕭德孫及其弟，人稱「虎溪二龍」。

144 如蕭南翔、蕭南壽兩人便從其習詩。劉將孫，《養吾齋集》，卷 28，〈登仕郎贛州路同知寧都州事蕭公行狀〉，頁 2。

145 以上俱見劉岳申，《申齋集》，卷 11，〈蕭熙明墓誌銘〉，頁 11-13。

146 如蕭宗古與其晚輩蕭甲叟都是劉辰翁的弟子；劉岳申，《申齋集》，卷 10，〈蕭存遠墓碣〉，頁 10-12。劉將孫曾讀書虎溪蕭氏西塾與蕭宗大為忘年交；劉將孫，《養吾齋集》，卷 28，〈登仕郎贛州路同知寧都州事蕭公行狀〉，頁 2。據《劉辰翁年譜》知劉將孫是咸淳七年(1271)始於虎溪讀書，而劉辰翁則是德祐元年(1275)到景炎元年(1277)間避難虎溪；劉宗彬編，《劉辰翁年譜》，頁 7970-7973。

147 劉岳申亦與蕭甲叟相友，見劉岳申，《申齋集》，卷 10，〈蕭存遠墓碣〉，頁 10-12。

148 劉岳申，《申齋集》，卷 11，〈蕭熙明墓誌銘〉，頁 11-13。

通過前幾節的討論可知，同水、延福兩鄉與縣城以楊長孺與劉清之之學為主，文昌鄉則以劉實翁、王充耘的《尚書》學最重要。但兩區域間除了劉辰翁曾因避難而寄宿虎溪蕭氏以外，很少見到彼此學術交流的事例，這使我們有必要思考兩區域間學術是否交流不多。

從另一個角度看，同水、文昌兩鄉與縣城三地各有書院、私塾或家塾，同水鄉以南麓齋為中心，縣城先後有古城義塾與東山書院，文昌鄉則有文昌書院。這幾間書院或私塾是在地方家族支持下所建，都只是鄉里層級的書院。在吉水，我們並未見到一間縣級的書院，足以發揮聚集全縣士人，成為全縣重要學術中心的例子。這一點也可呼應同水與文昌兩鄉交流不盛的現象。

究其原因，地緣上的距離，應是造成兩地交流不密切的關鍵因素。吉水的同水、仁壽、中鵠、折桂、文昌五鄉中，同水鄉位於最北端，贛江流經同水鄉東側、南端，然後進入廬陵縣境，而在折向同水鄉南端前，贛江另有分支歧而向東，過仁壽鄉南，進入永豐縣。因此贛江的主支以南是中鵠鄉，往東的分支以南是折桂鄉，文昌鄉則又比中鵠、折桂兩鄉更南。於是一方面同水鄉既在地理位置最為獨立，且因左側緊鄰廬陵，所以與廬陵延福鄉的關係密切；一方面文昌鄉與同水鄉之間距離既遠，中間又相隔折桂、中鵠兩鄉，因此兩鄉間的交流自然不多。至於吉水縣城位於仁壽鄉南端、贛江分流前的節點旁，正好處於水路交通樞紐，故常見各方的學術交會於此。

直到明中期，兩鄉關係仍不密切。兩鄉是吉水學術最發達的區域，有明一代，吉水的五位狀元劉儼(1442 年狀元)、彭教、胡廣、羅洪先、劉同升，除了胡廣居縣城左近，劉、彭二人與羅、劉二人分別是

149 吳澄，《吳文正公集》，卷 76，〈大元將仕郎南豐州判官蕭君墓志銘〉，頁 8-10；卷 80，〈故貢士蕭君墓誌銘〉，頁 13-15。

文昌鄉與同水鄉人。[150]若考慮到王艮(1483-1541)原本第一，因貌寢被易為第二，則文昌鄉便有三位狀元。但明中期以羅洪先為中心的陽明學活動，文昌鄉卻幾乎未曾參與在內，以致羅洪先的弟子曾同亨在多年後前往文昌鄉訪問時，感歎當地家族無人留心性命之學。[151]

地緣因素與距離遠近所造成的影響，也凸顯出行政區劃的限制；即使在同一個行政區劃如縣的範圍內，同縣各鄉未必是同質性的發展，亦即我們不易從朱子學在同水鄉與縣城的流傳情形，得出朱子學曾流行於全縣的學術判斷；反之亦然。因此，當一縣的各個區域各有不同的學術發展，其學術傳承不時中斷，但各個區域間的學術交流又不密切時，我們應該怎麼討論這個縣的學術？學術發展的破碎化，使人很難用單一鄉里為例來說明吉水全縣的學術狀況。

儘管如此，這並非否定了對大地域範圍論述的價值。前文引述《宋元學案》對元代朱子學流行於江右的判斷，而本文則指出朱子學在吉水當地的發展既不連續且不穩定。綜合此二則判斷，不僅有助我們具體了解元代朱子學在江右流行的情形與程度，也可以從《宋元學案》以外的角度看吉水當地的學術發展。學案上載劉清之、歐陽守道二人都是吉州一帶的朱子學者，而其學術則被放到全國性的朱子學脈絡下討論，其門下弟子來自四面八方，顯示其學廣為流傳，但卻不易了解其學術廣傳的程度及傳承何時中斷。一旦加入地域性的因素，則可看到二人的學術傳習不久便未見著名傳人，顯示朱子學尚未建構出強固的地方性學術傳承與傳統。這也說明對大地域範圍的論述，以及對此論述所作的細膩分疏，彼此不僅並不相妨，而且可以互為補充。

150 《(光緒)吉水縣志》，卷 2，頁 56。

151 曾同亨，《泉湖山房稿》，卷 9，〈吉水圓塘錢氏族譜序〉，頁 4-6；卷 8，〈荷塘廖氏族譜序〉，頁 29-31。相關研究見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第 3 章第 6 節。

明初書院發展漸趨停滯，相較下地方學校的重要性日增，加上地方的著名學者常被招攬入學校擔任教職。[152]士人聚集學校讀書的結果，使得來自不同鄉里的士人得以更頻繁接觸與交流。此外，研究指出，明初吉水士人在科舉考試上取得高度成就，重要人才都入朝當官的結果，京師反而取代地方鄉里成為學術中心所在，[153]人們在京師常與同府不同縣的人往來交遊，所以我們越來越常見到吉水士人的傳狀或墓誌銘是由他縣士人所作，類似現象在元代都是比較少見的。明初吉水學術漸往不同的方向發展。

八、明初吉水經學與家族的後續發展

在明初縣城學校成為吉水當地的學術中心以前，元末已有不少知名人物在吉水縣學任教，如解縉指出：

> 元主中朝，自泰定、天歷後，文治聿彰，四方典教諸君子悉皆碩德宿儒，先大父竹梧公[按：解子元]與道益張先生，蒞教吉水州學，鼓舞作新，一時文物蓬蓬然起焉。[154]

解縉的祖父解子元與張道益二人都任教於吉水州學，可知「典教諸君子悉皆碩德宿儒」並非虛言。[155]夏朗劉實翁族曾孫劉子彰、玄孫劉桓秉承其族《尚書》學分別在洪武、永樂年間任吉水縣學訓導，「邑士

152 關於宋元明三代書院的研究，見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據曹松葉的統計，元中期以後書院的數量呈現增長的趨勢，這反應了書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此後從明初到明中期前，書院的數量都未再有明顯增長，這也符合我們對明初重官學而輕書院的印象。

153 Anne Gerritsen, *Ji'an Literati and the Local in Song-Yuan-Ming China*, ch6.

154 解縉，《解文毅公集》，卷 13，〈時和曾先生墓誌銘〉，頁 19-21。

155 張道益傳見《(光緒)吉水縣志》，卷 37，〈文苑〉，頁 8。

大夫多出門下」。[156]過去在古城義塾講學的曾革，其曾孫曾琦(1344年通過鄉試)也在洪武年間與解縉之父解開同任訓導。[157]至於解開對明初吉水學術的影響頗大，故府志、縣志都說「吉水文學自(解)開始」，[158]許多士人或學者，如胡廣本人及其兄弟、[159]周徧、[160]徐子耕、[161]歐陽衡等人，[162]可能都因入縣學而受解開指導。也有人任教於其他府、縣的府學或縣學。[163]同時期縣城也有書院講學活動；如世居縣城的劉惠庭建仁山書院，延請解縉之兄解大經、曾琦等人講學。[164]

儘管元末明初吉水縣學與書院都不乏知名經師執教，但此後當地經學卻漸衰，若據《吉水縣志．藝文志》所載，緊接在經學著作林立的元代之後，明初幾乎不見什麼經學著作，須待明中期以後才又有相關著作出現。此處無法細究其因，若據四庫館臣解釋，則跟靖難之變，元末經師相繼凋零有關：「元人篤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明則靖難以後，耆儒宿學，略已喪亡。」[165]

另一方面則跟永樂年間編定《五經大全》、盡棄古注疏有關，此

156 解縉稱夏朗劉氏的《尚書》學惟劉子彰得其奧，見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9，〈故西山劉先生〉，頁 8-10。《(光緒)吉水縣志》，卷 37，〈文苑〉，頁 14。劉子彰與劉迪哲的關係見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9，〈故西山劉先生〉，頁 8-10。

157 解縉，《解文毅公集》，卷 13，〈時和曾先生墓誌銘〉，頁 19-21。

158 《(光緒)吉水縣志》，卷 37，〈文苑〉，頁 11；《(萬曆)吉安府志》，卷 19，頁 3-4。

159 胡廣，《胡文穆公文集》，卷 13，〈解原昌墓誌銘〉，頁 18

160 《宋元學案補遺七》，卷 82，頁 321-322。

161 《宋元學案補遺七》，卷 82，頁 322。

162 《宋元學案補遺七》，卷 82，頁 295。

163 明初學校教官的研究，見吳智和，《明代的儒學教官》。

164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7，〈仁山書舍記〉，頁 9-10。

165 《四庫全書總目》，卷 16，頁 128。

後士人習經只能拘守《五經大全》之說，難免固陋之病，以致元末經師凋零後，不再有後繼者。如四庫館臣引鄭曉(1499-1566)之言指出：

> 鄭曉《今言》曰：「洪武開科，五經皆主古注疏，……後乃盡棄注疏，不知始於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為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然古注疏終不可廢也。」是當明盛時，識者已憂其弊矣。[166]

既然士人準備科考時只須讀《五經大全》而不必習古注疏，經師的重要性自然大減，所以四庫館臣引顧炎武(1613-1682)之言說：「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閒，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誠深見其陋也。」[167]在此大趨勢下，吉水的幾個家族在明初雖各有不同的發展，但同樣都面臨經學中衰的問題。

明初同水鄉與廬陵印岡在學術上的往來漸疏，這可能跟秀川羅氏本支中衰，而位於同水鄉的其他房支崛起有關；如晚明羅大紘回顧秀川羅氏的發展時說「至宋豫章氏以理學顯，後遂無聞」，又說「吉郡諸羅視前代稍著」、「至本朝吉州羅姓始大」，[168]吉州指吉水而言，顯示入明以後其他房支已勝過本支。

同水鄉湴塘、楊莊的楊氏家族，其南麓齋在元末兵亂遭毀，楊舟雖復闢館以授學者，但其族卻有中衰跡象，如李時勉觀察楊氏祠堂指出：「故元盛時，楊氏之賢同知崑山事(楊)學文始復文節故居為祠，規制廣於前，而益加多。歲久弗治，田蕪宇傾」，[169]可知無人負

166 《四庫全書總目》，卷 5，頁 28。

167 《四庫全書總目》，卷 21，頁 170。

168 羅大紘，《紫原文集》，卷 3，〈陶金驛羅氏族譜敘〉，頁 57；卷 3，〈山原羅氏譜略〉，頁 41。

169 李時勉，《古簾文集》，卷 3，〈楊氏重修祠堂記〉，頁 27；《(光緒)吉

責祠堂的管理。直到永樂年間楊瑒始重修祠堂，並增建南麓齋，其子楊敝進一步纂集楊氏家乘，[170]但二楊都不以學術聞名，南麓齋也未能回復舊時盛況。直到明中期以前湴塘楊氏未再見傑出人才。

文昌鄉的部分，帶源王氏在功名上續有發展；如王充耘的下一代王無將(1388 年進士)、王樂孟、王艮都是進士出身。王艮在靖難之變時死節，[171]此後其族亦少再見知名人物。

縣城東門解氏家族在明初功名成就不凡，如解璋之子解繪(1406年進士)、解榮(1399 年舉人)兄弟，都分別考取功名，解縉則是永樂朝名臣。但此後解氏家族卻漸中衰，即使是元末曾名聞一時的解觀，其人其學也不再為人所重。從明初楊士奇說「惜乎其人國史無聞焉」，可知這位曾被吳澄所器重的人物，其名並未載諸國史；[172]直到明末陳弘緒(1597-1665)才以掇拾異聞的方式在《寒錄夜》中記載其名，並感歎說：「今江右不知有此君，不但海內無聞焉，為之一歎。」[173]

夏朗劉氏與泥田周氏應是後續發展最好的兩族。明初夏朗劉氏仍以《尚書》學為家學傳承，如劉永敬之子劉纘以《尚書》學教族中子弟，時人稱其「學以窮理為先，行已為要，教孚於家庭，賢推于鄉邑」。當時夏朗劉氏一族已達三百餘家之多，劉纘、劉永性兄弟於是

水縣志》卷 56，頁 10 也收錄此文，但將此記作者誤題為解縉。

170 元末楊元正以儒士薦為太常禮儀院奉禮郎兼翰林檢討，他在廬陵為楊存、楊邦乂、楊萬里、楊長孺、楊孫孖，及其父楊學文建楊氏忠節祠。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7，〈南麓齋記〉，頁 69-71；揭傒斯，《揭文安公文粹》，卷 1，〈楊氏忠節祠記〉，頁 35-36。楊元正的傳記見(嘉靖)《吉安府志》，卷 11，〈翰苑〉，頁 25。楊敝的傳記見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 105，〈衛府右長史楊敝傳〉，頁 31。楊敝纂集楊氏家乘事見梁潛，《泊菴集》，卷 5，〈楊氏家乘序〉，頁 1-2。

171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翰林脩撰王君欽止先生〉，頁 46-48。

172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 18，〈策場備要〉，頁 8。

173 陳弘緒，《寒夜錄》，下卷，頁 11。

致力修譜、作祠，時人讚賞其成效說：「鄉族之名為有禮法而能繼承不墜者，莫過劉氏」。[174]此後劉纘之子劉訓(1423 年舉人)、劉誡(1423 年舉人)、劉諭(1445 年舉人)分別考取舉人，[175]從子劉鉉得中進士(1415 年進士)，劉儼高中狀元。[176]劉儼、劉諭曾合作《宗範》以約束族人。[177]

泥田周氏雖因元末兵亂而稍衰，明初旋即復振，[178]重振之機則在周聞孫之孫周鳴。周鳴主要從其叔父周霖(居仁壽鄉五都)學習《尚書》及其他經傳，並撰述過一些經學著作。[179]周鳴秉承周聞孫的觀念，要求族人合族而不分家，[180]遂使「居泥田者猶千餘人」：[181]

> 合三從之親為一爨，人近千指，服用皆有常度，著《家範》十數條，以示子孫。族子弟性敏者，悉令肄經學、取祿仕，其有歿官不能歸葬者，必為經理而歸之。[182]

174 王直，《抑菴文後集》，卷 27，〈贈侍讀劉公墓表〉，頁 49。

175 《(光緒)吉水縣志》，卷 34，〈宦業〉，頁 35。

176 柯暹，《東岡集》，卷 7，〈書菴劉先生墓誌銘〉，頁 1-4。劉永敬之兄(弟)劉永寧，以經學聞名，二子劉永性與劉率性(名循)亦以學行為鄉里所重。劉儼即劉永性之子，而劉鉉即劉率性之子。王直，《抑菴文後集》，卷 24，〈贈禮部侍郎謚文介劉公神道碑〉、〈副使劉公墓碑〉，頁 32-35。

177 羅洪先，《念菴文集》，卷 11，〈夏朗劉氏重刻宗範序〉，頁 26-27。

178 梁潛，《泊菴集》，卷 4，〈重榮桂軒記〉，頁 23。

179 楊榮，《文敏集》，卷 19，〈故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致仕周君墓碑〉，頁 7-9。

180 從周聞孫到周鳴皆不願分家，因此其族子弟除了有功名成就外，同時也必須有人佐理家務。周鳴之子周敘為翰林脩撰，另一子周勉(字功懋)則「弱冠父命理家政，凡四十年，一門之聚常百二十餘口，公私百需皆功懋主之。蓋自山長(周聞孫)以來不異爨。至職方(周岐鳳)尤篤義不倦。」王直，《抑菴文後集》，卷 27，〈周功懋墓表〉，頁 14-15。

181 王直，《抑菴文後集》，卷 8，〈吉水泥田周氏族譜序〉，頁 16。

182 楊榮，《文敏集》，卷 19，〈故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致仕周君墓碑〉，頁 9。

泥田周氏子弟不僅在科考上表現傑出，不少人在中央或地方任官，學術上亦輩出能人。如周榘(1370 年進士)以經學聞名，曾負責蘇、松一帶水利，以經義治水而獲得成功；當他被謫戍廬陵時，又因經學之名吸引李昌祺的跟隨。[183]周啟對《春秋》學頗有心得，曾與修《永樂大典》；居鄉時則協助撫育叔父周榘之子，並教導族中與鄉里子弟。[184]

泥田周氏的盛衰之跡，可從族譜修纂的情形看出。泥田周氏在洪武、永樂年間都曾修譜，永樂譜由周鳴倡修，周啟之子周道從旁協助；此後周鳴之子周敘與周南巽、周迪、周紀、周源等人共修宣德譜，[185]並遵照周鳴的囑咐，在周道的協助下，新作泥田周氏祠堂，祠制悉倣《朱子家禮》。[186]此刻可說是泥田周氏聲勢最顯赫時。此後泥田周氏似有由盛轉衰之勢；查考方志的選舉志，直到正德朝以前，很少再有泥田周氏族人考取舉人以上功名者，[187]這跟泥田周氏在纂修完宣德譜後，歷經百年時間，直到嘉靖朝以前都未再修譜的現象正相符應。[188]

明中晚期吉水陽明學流行期間，過去有關經學的歷史慢慢被淡化甚至抹去了，從當地陽明學者主導編纂的萬曆《吉安府志》的〈人物表〉便可看出風氣的轉變。明代吉安府志始修於成化年間，此後正德、嘉靖、萬曆年間，又歷經三次的編纂工作，分別完成「正德戊辰志」、「嘉靖壬午志」與「萬曆志」。正德志不傳，嘉靖志僅餘殘本，但因萬曆志的〈人物表〉分別表列出正德、嘉靖、萬曆三個版本府志

183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乙集，頁 236，「周台州矩」條。
184 王直，《抑菴文後集》，卷 34，〈周公明傳〉，頁 16。
185 羅洪先，《念菴文集》，卷 12，〈泥田周氏族譜序〉，頁 53-56。
186 王英，《王文安公詩文集》，卷 3，〈吉水泥田周氏祠堂記〉，頁 37-38；楊士奇，《東里續集》，卷 34，〈周處士墓誌銘〉，頁 22。
187 周仲在正德朝中舉，而嘉靖朝則有周延與周仲之子周汝員考取進士功名。
188 羅洪先，《念菴文集》，卷 12，〈泥田周氏族譜序〉，頁 53-56。

的人物表，使我們可藉此觀察三本府志所選錄人物的變動。參考萬曆志的〈凡例〉所言，正德志人物表有四百多人，嘉靖志有九百多人，萬曆志刪節為五百多人，而僅新增八十多人而已。[189]萬曆志所錄的人物傳記數目跟正德志相當，但細查兩本所錄人物卻有很多的不同，不少原本錄入正德志的元代經學人物，在萬曆志中卻被一一刪去，或被放到與學術無關的傳記中。解觀、解蒙、劉震、王充耘，以及周聞孫、周鳴、周焱等人都曾列名正德志上，而在萬曆志卻被刪去不錄。這既是晚明陽明學者輕忽元代經學家的一個例證，也凸顯了在學術風氣的轉變下，這些原本在元代聲名赫赫的經學家，越來越不受重視的趨勢。[190]

九、結語

本文以元代吉水為中心，著眼同水鄉、縣城與文昌鄉三個區域，討論當地歷經宋末、元及明初的學術發展。綜合前文的討論，可知當地經學發展呈現多元而破碎的圖像，而且學術的流傳頗受到地域範圍的限制，以致於同水、文昌兩鄉雖在同縣，但兩鄉士人或家族間的經學的交流並不密切。

細部來看，首先，同水、延福兩鄉與縣城的學術發展，讓我們看到朱子學如何進入地方，取得地方人士的支持。縣城東門解氏家族的學術淵源於楊長孺、劉清之，接著先後有人習於歐陽守道、吳澄門下，從劉清之、歐陽守道到吳澄，幾位都是江右著名大儒，顯示吉水的學術並未與全國性的學術變遷脫節。相對於此，文昌鄉以

189 《(萬曆)吉安府志》，卷首，〈凡例〉，頁 2。

190 相關研究見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附錄二，〈吉安府價值觀的轉變——以兩本府志為中心的分析〉。

劉實翁、王充耘為主的《尚書》學，則凸顯地方經學一方面符合科舉功令之學的標準，但一方面又未完全消沒在朱子學的潮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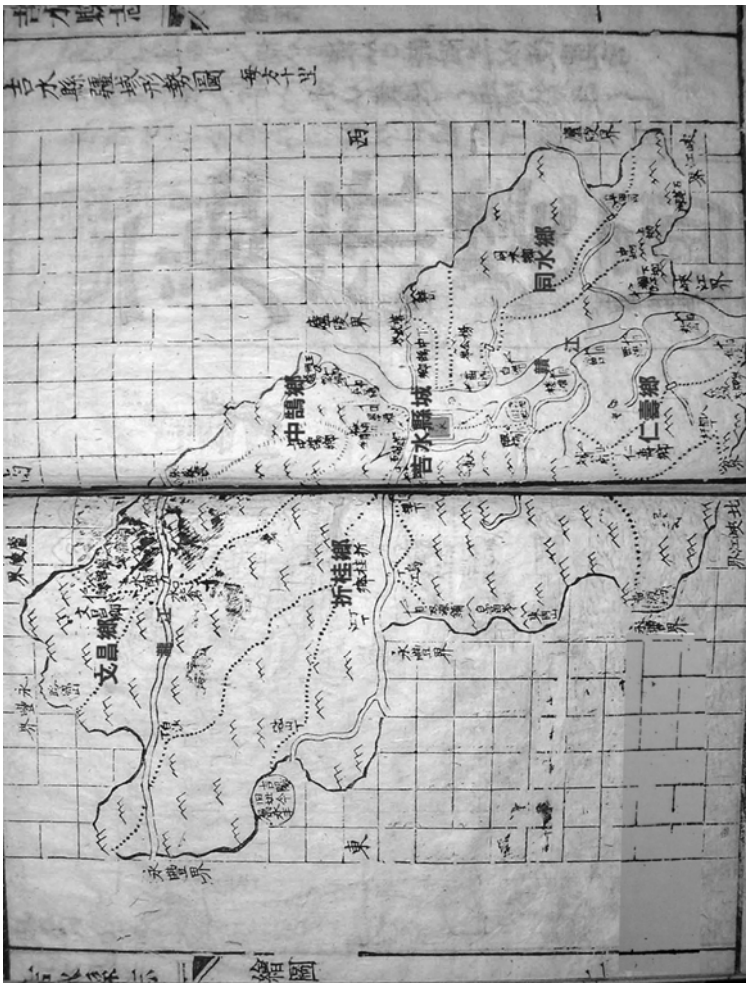
其次，相對於劉清之與歐陽守道二人在廬陵當地講學，吳澄主要在江西北部一帶活動，但他既與郭正表、羅履泰等人結交，又有解觀、解蒙兄弟前往求學，使其對吉水的影響力並不下於其他朱子學者。從這一點看，我們應思考吳澄在元代江右理學的重要性有凌駕前代與當代其他江右理學家的可能性。

第三，無論是朱子學或地方經學，其長期的發展趨勢往往跟地方家族有關。當視野拉長到兩到三代的時間長度來看，一門學術的傳承往往面臨後繼無人而中斷的命運，而家族的聯繫則使其族人可以在形式上宣稱承續其學，如楊莊楊氏的族人以南麓齋為中心宣稱承續楊叔方之學，就是很好的例證。長期來看，我們並未見到以吉水當地為範圍而建構的地方學術傳統，但卻有以家族為中心而建構的家族學術發展史。

最後，讓人感興趣的是，吉水當地既無強勢且連續不斷的經學傳承，而在鄉與鄉之間的經學交流受限於地緣遠近而不甚頻繁，則其地方學術傳統及認同的形塑，若是以縣或府為單位，如何克服地緣遠近的限制，而建構大地域範圍的傳統及認同，仍然是令人好奇的部分。另一方面，這類傳統及認同的形塑，固然有其虛構或想像的成分，但其虛構或想像是否能夠完全超越現實條件的限制之上，而不受其影響？又或者影響這類傳統或認同的形塑的關鍵因素，不在經學，而在其他，諸如文學之士的交流，若然，則元代經學與其他領域的知識或文化之間的關係，仍值得進一步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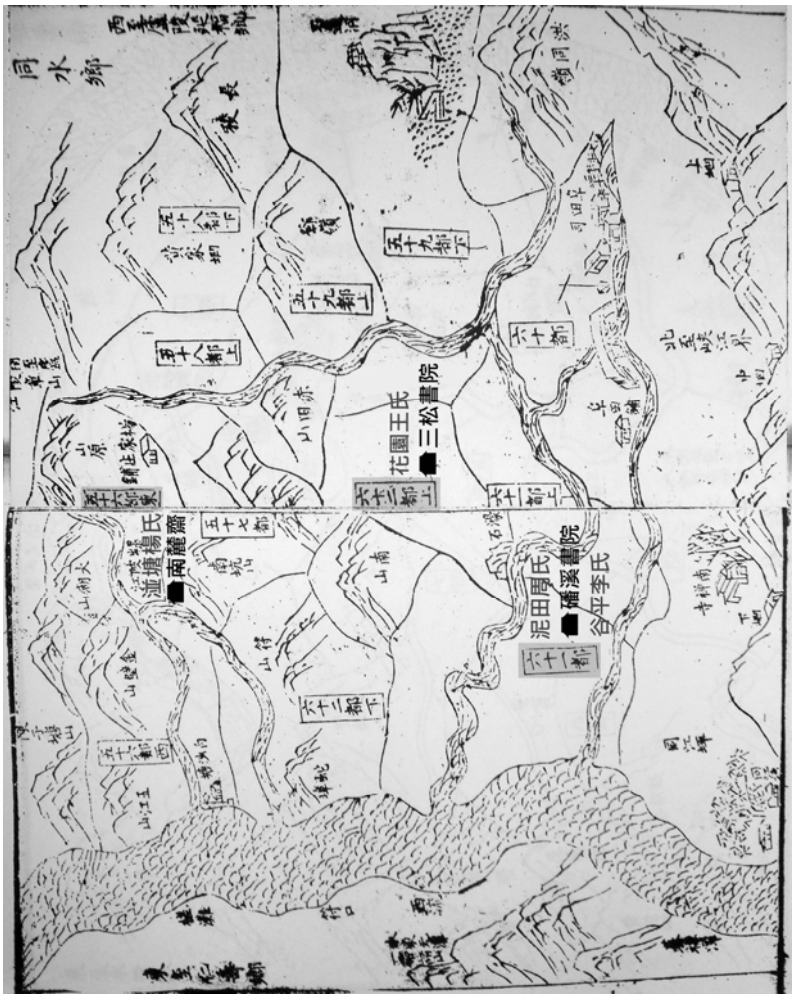
(本文於 2011 年 2 月 1 日收稿；2012 年 5 月 4 日通過刊登)

圖一　吉水縣疆域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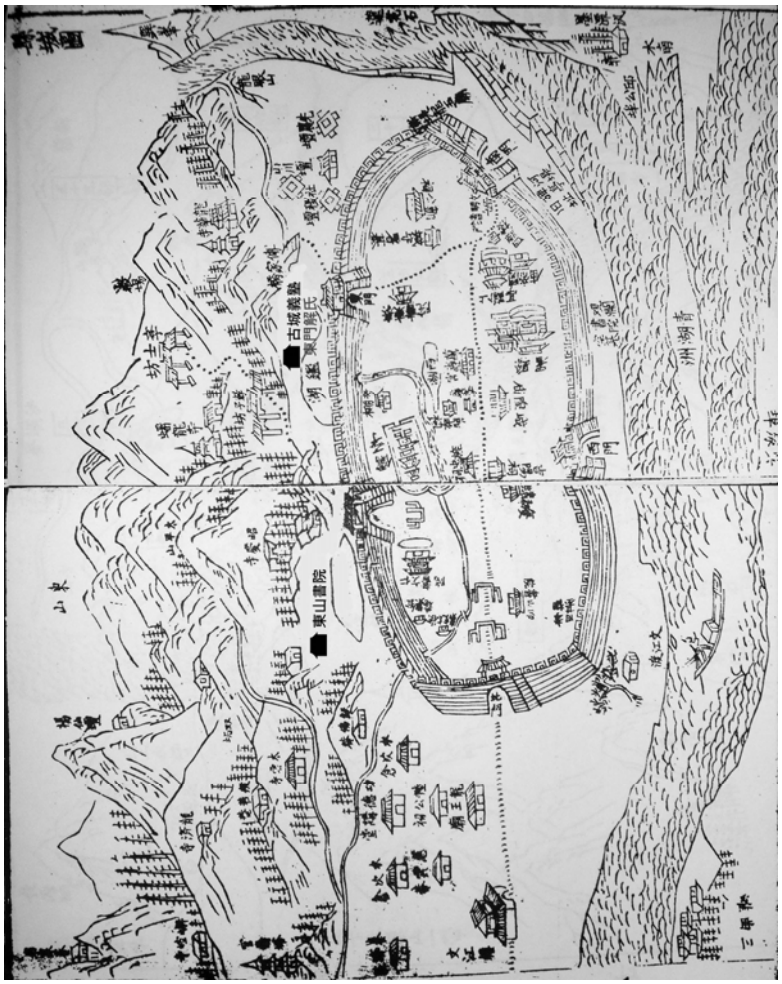


圖版來源：《(光緒)吉水縣志》，〈繪圖〉，頁 1-10。（下同，茲不贅）

圖二　同水鄉



圖三　縣城圖



圖四　文昌鄉



表 1 廬陵、吉水兩縣部分家族及其功名、著作表[191]

家族	人物	功名	重要經史子學著作
湴塘 / 楊莊楊氏	楊萬里	紹興廿四年進士	《易傳》、《葉丞相行狀》
	楊長孺	薦辟	
	楊邦乂	政和五年進士	《國語注》、《荀子註》
	楊叔方		《五經辨疑》、《曆法五行論》
	楊中		《四書正宗》、《楊氏雜著》、《示兒類編》
	楊舟		《詩經發揮》、《詩文策略》
	楊蠡	永樂十三年進士	
	楊濟川		
谷平李氏	李次魚	紹興十年通過解試[192]	
	李概 (次魚之子)	紹興年間通過解試，淳熙年間試集英殿[193]	
	李天麟		
	李奧	嘉定十五年賜釋褐進士[194]	
	李發	重和元年進士	
	李珏	薦辟	《錢塘百詠》[195]
花園王氏	王端禮	元祐三年進士	《易解》、《論語解》、《字譜》、《疑獄集》
	王鴻舉	靖康元年通過解試	
	王鵬舉	通過解試	
	王鷟舉	宣和五年通過解試	
	王子俊	薦辟	《史論》、《師友序言》
泥田周氏[196]	周子淵		
	周應龍 (子淵之子)	紹定年間博學宏詞科	
	周京孫 (應龍之子)	咸淳六年通過解試	《五經纂》、《史漢音辨》[197]

191 本表主要根據《(光緒)吉水縣志》的〈選舉志〉與〈藝文志〉，並參考相關文集與傳記資料製作而成。

192 解試或鄉試皆僅列第一次通過的年份。以下皆同。

193 《(光緒)吉水縣志》，卷 36，〈儒林〉，頁 4-5。

194 《(光緒)吉水縣志》，卷 36，〈儒林〉，頁 7。

195 《(光緒)吉水縣志》，卷 37，〈文苑〉，頁 3；劉詵，《桂隱詩集》，卷 4，〈題李鶴田穆陵大事記後〉，頁 55。

196 元代以後周氏族人的功名資料，多參考自王直，《抑菴文後集》，卷 8，〈吉水泥田周氏族譜序〉，頁 15-16；卷 12，〈送周教諭詩序〉，頁 39-41。梁潛，《泊菴集》，卷 5，〈泥田周氏族譜序〉，頁 25-27；羅洪先，《念菴文集》，卷 12，〈泥田周氏族譜序〉，頁 53-56。

197 《(光緒)吉水縣志》，卷 41，〈隱逸〉，頁 3。

	周雲		
	周商英 (周雲之子)		
	周堯章 (商英之子)		
	周夢瀧 (堯章之子)		
	周庭秀 (堯章之孫)		
	周聞孫	至正元年通過鄉試	《書經一覽》、《書題卓躍》、《河洛序說》、《五經纂要》、《學詩舟楫》[198]
	周成立 (聞孫之兄弟)	元統三年通過鄉試	
	周鳴	薦辟	《尚書通》、《春秋纂要》
	周榘	洪武三年舉人	
	周仲容	武平教諭(功名不詳)	
	周南巽	永樂廿二年進士	
	周純熙	監察御史(功名不詳)	
	周彥珍	雲南按察僉事(功名不詳)	
	周啟	貢士	《春秋望洋》、《策學舉要》[199]
	周迪 (周啟之子)	永樂十二年舉人，此後續中進士，但確定年代不詳	
	周源 (周啟之孫)	永樂十八年舉人	
	周敘 (周鳴之子)	永樂十六年進士	
	周勉 (周鳴之子)		
	周紀	永樂廿一年舉人	
	周正	天順元年進士	
	周延	嘉靖二年進士	
	周汝員	嘉靖八年進士	
秀川羅氏[200]	羅崩		
	羅達 (羅崩之子)		
	羅紼 (羅達之子)	政和八年貢士	
	羅上行	建炎二年進士	
	羅全略	乾道二年進士	
	羅維藩	乾道五年進士	
	羅維翰	乾道五年進士	
	羅全材	乾道八年進士	
	羅全德	乾道八年進士	
	羅瀛	紹熙元年進士	
	羅惟一		《尚書集說》

198 《(光緒)吉水縣志》，卷 37，〈文苑〉，頁 9-10。

199 王直，《抑菴文後集》，卷 34，〈周公明傳〉，頁 16。

200 秀川羅氏之功名資料俱見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81，〈羅氏一經堂集序〉，頁 3277-3278。

	羅如圭		
	羅子潛		
	羅俊		
	羅椅	寶祐四年進士	
	羅上達	鄉貢	
	羅維申	鄉貢	
	羅孚	鄉貢	
	羅澥	鄉貢	
	羅履泰		《三經集解》、《河洛衍義》
	羅大已		《史略》、[201]《四書直解》[202]
縣城東門解氏	解谷	淳熙十年省試及第	
	解子宣	薦辟	
	解龍翔	開慶元年進士	
	解夢斗	景定五年通過解試	
	解應辰		
	解應申		
	解觀	天曆二年通過鄉試[203]	《周易義疑通釋》、《四書大義》、《儒家博要》、《刑書考解》、《武經注》
	解蒙	天曆二年通過鄉試	《易經精蘊》
	解泰		《易義》
	解子元	至正午年進士	
	解開	貢士	
	解闓	貢士	
	解縉	洪武廿一年進士	《古今列女傳》、《學士奏議》
	解綸	洪武廿一年進士	
	解榮	建文元年舉人	
	解琛		
	解璋		《易經衍義》
	解繪	永樂四年進士	
夏朗劉氏	劉方正	紹定元年通過解試[204]	
	劉天聲	咸淳元年進士	
	劉新民	咸淳七年進士[205]	

201 此書等於是《資治通鑑》的節縮版，羅大已與王禮共同編纂註釋，以利初學閱讀。李祁，《雲陽集》，卷 5，〈史畧故序〉，頁 8。

202 此書是其門人弟子則將其日常講說的言論編纂而成。《(民國)廬陵縣志》，卷 19 中，〈文苑〉，頁 13。

203 儘管解縉強調解觀、解蒙是元統元年進士，與王充耘同榜，但查方志〈選舉志〉，卻只見王充耘而未見解觀、解蒙二人。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8，〈翰林院修撰王欽止先生墓表〉，頁 46-48；《(光緒)吉水縣志》，卷 28，〈選舉志〉，頁 13。

204 羅倫，《一峰集》，卷 6，〈雙節堂記〉，頁 18-19。

205 解縉，《解學士文集》，卷 9，〈西山劉先生墓表〉，頁 8-10，文中以劉新民為寶祐年間進士，但翻查〈選舉志〉，咸淳年間方是確解，故據以改正。《(光緒)吉水縣志》，卷 28，〈選舉志〉，頁 12。

	劉震	至治元年進士	《書經卓躍》
	劉實翁	至治三年通過鄉試	
	劉鳳 (劉震之孫)	至正元年通過鄉試	
	劉益厚		
	劉維德		
	劉永敬		
	劉永性		
	劉纘	永樂九年舉人	
	劉鉉	永樂十三年進士	
	劉誠	永樂廿一年舉人	
	劉儼	正統七年狀元	《續宋元通鑑綱目》
	劉論	正統十年進士	
帶源王氏	王相	至治元年進士	
	王充耘	元統元年進士	《讀書管見》、《書義矜式》、《書義主意》、《四書經疑貫通》、《擬兩漢詔誥》
	王濟	泰定三年通過鄉試	
	王無將	洪武廿一年進士	
	王艮	建文二年狀元	《平燕十策》
	王樂孟	永樂三年舉人	
虎溪蕭氏	蕭來新	景定三年進士	
	蕭南翔[206]	咸淳三年通過解試	
	蕭南壽	咸淳三年通過解試	
	蕭符世	咸淳四年進士	
	蕭宗古	咸淳六年通過解試[207]	
	蕭甲叟		
	蕭惟清 (符世之弟)	咸淳十年進士[208]	
	蕭如愚		
	蕭立夫	延佑二年進士	
	蕭霽	天曆二年通過鄉試	

206 蕭南翔在解試榜上名為蕭犖。劉將孫，《養吾齋集》，卷 28，〈登仕郎贛州路同知寧都州事蕭公行狀〉，頁 2。

207 劉岳申，《申齋集》，卷 10，〈蕭存遠墓碣〉，頁 10-12。

208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 28，〈登仕郎贛州路同知寧都州事蕭公行狀〉，頁 2。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光緒)吉水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光緒元年刻本。
《(同治)新建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同治十年刻本。
《(萬曆)吉安府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明萬曆年間刻本。
《(嘉靖)江西通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明嘉靖四年刊本。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平溪羅氏四修族譜》，上海圖書館藏民國一經堂木活字本。
《江西省吉安縣地名志》，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7。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王沂，《伊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8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按：以下引《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版本皆同，茲不贅。
王直，《抑菴文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2 冊。
王英，《王文安公詩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32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南京圖書館藏清樸學齋抄本。
王庭珪，《盧溪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4 冊。
王梓材、馮雲濠編，《宋元學案補遺》，臺北：世界書局，2009。
王義山，《稼村類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3 冊。
王禮，《麟原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0 冊。
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揚州馬氏刻本。
何中，《知非堂稿》，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4 冊，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清鈔本影印。

吳寬，《家藏集》，收入《四庫明人文集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吳澄，《吳文正公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中央圖書館所藏成化刊本影印。

宋濂，《宋學士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314-3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侯官李氏觀槿齋藏明正德刊本影印。

李祁，《雲陽李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6 冊，據清鈔本影印。

李時勉，《古廉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2 冊。

周必大，《文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7-1149 冊。

周密，《癸辛雜識》，收入《學津討原》，第 26 函，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嘉慶張海鵬輯刊本影印。

金幼孜，《金文靖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據明成化四年新淦金氏家刊本影印。

胡廣，《胡文穆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別集類第 28-29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刻本及清乾隆十六年胡張書等刻本影印。

范邦甸，《天一閣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張栻，《南軒集》，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

梁潛，《泊菴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00 冊，據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

許謙，《白雲集》，收入《金華叢書》，第 17 函，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據清光緒間胡鳳丹輯本影印。

揭傒斯，《揭文安公文粹》，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

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據豫章叢書本排印。

曾同亨，《泉湖山房稿》，東京：高橋情報，1991，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影印。

焦竑，《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530冊，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橒曼山館刻本。

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楊士奇，《東里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楊士奇，《東里續集》，明天順五年廬陵楊導編刊本。

楊榮，《文敏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據明正德十年建安楊氏重刊本影印。

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藏外道書》，第 35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

解縉，《解文毅公集》，清乾隆丙戌年序敦仁堂刊本。

解縉，《解學士文集》，明嘉靖四十一年遵化古松段刊本。

解縉，《解學士全集年譜》，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晏良棨刊本。

鄒元標，《鄒子願學集》，東京：高橋情報，1990，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四十七年序刊本影印。

劉三吾，《坦齋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9冊，據明萬曆六年刻本影印。

劉宗彬編，《劉辰翁年譜》，收入《宋人年譜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劉岳申，《申齋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據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影印。

劉將孫，《養吾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9 冊。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聶豹，《雙江聶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別集類第72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刻隆慶六年印本。
羅大紘，《紫原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39-14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首都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羅洪先，《念菴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5 冊。
羅椅，《澗谷遺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20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民國羅嘉瑞刻本影印。

二、近人論著

土田健次郎著，朱剛譯，《道學之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方誠峰，〈統會之地──縣學與宋末元初嘉定地方社會的秩序〉，《新史學》，16：3(臺北，2005)，頁 1-22。
吳智和，《明代的儒學教官》，臺北：學生書局，1991。
徐梓，《元代書院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1-4，分別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0：111(廣州，1929)，頁 3-31；10：112(廣州，1930)，頁 13-31；10：113(廣州，1930)，頁 3-29；10：114(廣州，1930)，頁 3-24。
陳雯怡，《從官學到書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曾華東，〈楊萬里性論的儒學構成〉，《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7：4(南昌，2006)，頁 29-32。
曾華東，〈楊萬里治易考〉，《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8：3(遼寧，2005)，頁 125-128。

黃沛榮，〈元代《易》學平議〉，收入楊晉龍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頁 159-194。

黃寬重，〈宋代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運作——以縣為主的考察〉，收入《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頁 274-275。

詹海雲，〈吳澄的《易》學〉，收入楊晉龍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237-268。

熊慧嵐，〈宋代蘇州州學的財務經營與權益維護—— 兼論州學功能與教授職責的擴增〉，《臺大歷史學報》，45(臺北，2010)，頁 79-116。

劉師舜，《墨莊劉氏之創始與繁衍》，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

蔣秋華，〈王充耘的《尚書》學〉，收入楊晉龍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363-393。

蔣秋華，〈明人對蔡沈《書集傳》的批評初探〉，收入林慶彰、蔣秋華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 269-294。

蕭東海，《楊萬里年譜》，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

蕭啟慶，〈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1(臺北，2010)，頁 1-36。

Gerritsen, Anne. *Ji'an Literati and the Local in Song-Yuan-Ming China*. Boston: Brill, 2007.

Neo-Confucianism, Academies, and Local Clans: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Studies in Jishui County, Jiangxi from Late Southern Sung through Early Ming

I-hsi Ch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focusing on a single county, Jishui, 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Yuan dynasty. By focusing on the village level, it illuminates classical studies as a local phenomenon, comparing their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also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local elites and clans, which sustained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by establishing local academies. The Zhu Xi school of Confucianism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the Yuan dynasty, coming to dominate other schools due to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However, even the Zhu Xi school, like other strand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locality could not sustain itself for long periods. This fact highlights the variety of concrete conditions facing Confucianism in different localities, and it reminds us that research on the village level is necessary to avoid overly broad generalization.

Keywords: Jishui County, Neo-Confucianism, Confucian Classics, Yang Wanli, Shujizhuan